

## 縣域社會中的國共關係：以抗戰時期江蘇豐縣為例

項浩男\*

### 摘要

長期以來，學界對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研究大多著眼於兩黨高層，探究雙方黨、政、軍之間的互動，或聚焦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事件，缺少微觀層面的長時段研究，尤其是以國民黨縣級政權為對象的研究比較少見。

以江蘇省豐縣為個案，以黃體潤日記為主要材料，能夠完整呈現出抗戰時期一個蘇北小縣內跌宕起伏的國共關係。徐州會戰後，豐縣淪陷，國共短暫地合作抗日，但雙方除人情紐帶外，缺乏互信，在內外各種因素的交織影響下，最終分道揚鑣，衝突不斷，以破裂而告終。中共的強勢崛起，擠壓了國民黨地方政權的生存空間，為雙方戰後的命運埋下了伏筆。國民黨基層幹部黃體潤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堅守理念，為抗戰作出的貢獻需要肯定。抗戰時期豐縣的國共關係，既受到大的歷史環境的影響，是時代的投影，也與豐縣自身的特點密切相關。板塊邊緣、結構裂縫、人情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塑造了豐縣的複雜形態。透過豐縣故事，既能瞭解國共兩黨迥異的政黨基因、組織模式和行為方式，也能看到人情、關係、地方利益等產生的影響，還能對中共的統一戰線獲得更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豐縣、黃體潤、抗戰、國共關係、統一戰線

---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 **Relations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in County Society: Taking Feng County of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A Case Study**

Xiang, Hao-nan\*

###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Kuomintang (KMT) an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ave not been conducted from the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Taking Feng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as a case and by exploring the diary of Huang Tirun, this study intends to fully illustrate the up-and-down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county society. After the fall of Feng county to the Japanese, KMT and CPC fought together against the Japanese troops temporarily. However, apart from the personal ties, the two parties had no mutual trust.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ir relations finally broke down. Huang Tirun's contribution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deserves more attentions. The relations between KMT and CPC in Feng county during that period was affected not only by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but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ng county itself, that were form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area boundary, structure split, and political favoritism. Through exploring the story of Feng county,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of party nature, structure, and way of conduct between KMT and CPC Party can be distinguished, and, more importantly, local interest and politics, human relationship can also be reflected in depth.

**Keywords:** Feng County, Huang Tirun, anti-Japanese War, KMT–CPC Relations

---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 壹、前言

國共關係是抗戰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演變，不僅影響了戰局的走向，重塑了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格局，還為戰後國共實力的此消彼長埋下了伏筆。鑒於這一課題的重要性，既有研究給予了充分重視，成果斐然，涉及諸多問題，如國共高層的戰略佈局和談判交涉、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破裂、敵後的武裝衝突等。總體而言，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研究側重高層較多，關注基層較少；以中共為主體的較多，反映國民黨立場的較少；對短期內發生的事件關注較多，對長期變遷關注較少。如果能從微觀層面以國民黨政權為對象進行長時段探究，想必能對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有所裨益。

豐縣，地處江蘇省西北端，是蘇魯豫皖四省的交界，臨近隴海鐵路和津浦鐵路，靠近戰略要衝徐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這裡是中央勢力和地方實力派的結合部，亦是中共建設根據地的舞台。徐州會戰後，豐縣及周邊地區相繼淪陷，從宏觀上看，豐縣是國民黨魯蘇戰區和中共冀魯豫根據地的交接地帶，國、共、日偽犬牙交錯；從微觀上看，國共雙方均擁有縣級政權、武裝力量和政黨組織。豐縣的國共關係在合作、分歧、誤解、衝突中歷經波折，以合作抗擊日偽為始，以中共的強勢崛起為終，既是大時代的縮影，亦有自身的特點，大小環境交織塑造了豐縣的複雜形態。

豐縣的抗戰史，離不開黃體潤。黃體潤，字玉山，生於 1896 年，是國民黨豐縣地方黨、政、軍首腦人物之一。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黃體潤進入國民黨豐縣黨政機構工作，他先後出任縣黨部執行委員、縣政府第一科科長，全面抗戰爆發後，黃體潤又兼任了縣政府秘書、民眾組織委員會總幹事、動員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務，實際主持抗戰動員工作。<sup>1</sup> 1938 年五月中旬，豐縣縣城淪陷，黃體潤在短時間內代理縣長，後任縣黨部書記長，主持組建了豐縣義勇壯丁常備大隊，任副大隊長。這支隊伍是豐縣地方武裝的根基，雖然番號和編制幾經變化，實際領導者一直是黃體

---

<sup>1</sup> 黃體潤少年時在城南務本高小學習，畢業後考入徐州江蘇省立第七師範學校，1920 年畢業。曾在蕭縣郝集小學任教，1925 年任豐縣教育局視學，1926 至 1927 年任豐縣師範學校校長。黃體潤，《黃體潤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第 1 冊，序言，頁 1-2。以下簡稱為《日記》。

潤，他亦是處理豐縣國共關係的靈魂人物。<sup>2</sup> 豐縣檔案館現藏有黃體潤的日記和書牘，時間連續，內容詳實，為探究抗戰時期豐縣的國共關係提供了珍貴資料。<sup>3</sup> 以豐縣為個案，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也具有視角和材料上的創新性。

本文以時間為線索，以黃體潤及其領導的國民黨豐縣政權、地方武裝為敘述主體，綜合運用目前可蒐集到的各種資料，<sup>4</sup>對抗戰時期豐縣的國共關係分四個階段探究。本文在行文時儘量做到「小歷史」與「大歷史」相結合，在圍繞豐縣展開論述的同時，關照到宏觀歷史、高層意志、周邊區域、人際關係等對縣域社會的影響，努力呈現出宏大歷史脈絡中發生在地方小邑的生動故事。<sup>5</sup>

<sup>2</sup> 之所以說黃體潤是抗戰時期豐縣國共關係的關鍵角色，有三點原因：第一，黃體潤在豐縣黨政機關任職多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尤其是擔任縣政府第一科科長，對縣政的日常運作具有重要影響，在當地擁有很高威望；第二，黃體潤是豐縣地方菁英中的核心人物。據其日記可知，黃體潤的至交王香山、李貞乾、董玉珏、董雪山、彭世亨等人均在縣政府、縣黨部擔任要職，如李貞乾曾任縣黨部執行委員，董雪山曾任縣立示範學校校長，董玉珏曾任縣教育局局長，彭世亨曾任縣民眾訓練委員會主任，這些人與黃體潤關係密切，共同構成了一張權力網絡，豐縣黨政的大事小情幾乎都由他們決定，其中又常以黃體潤的意見最為重要，其他幾人遇事皆與其相商；第三，黃體潤是豐縣地方武裝力量的實際創建者和領導者。全面抗戰爆發時，黃體潤正在參加廬山訓練，接受了抗戰訓練，回縣後在抗戰宣傳和動員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為日後建立豐縣的地方武裝奠定了基礎。1937年12月20日，江蘇省政府任命董玉珏為豐縣縣長，董與黃私交極好，縣中大事小情皆倚仗黃體潤。豐縣淪陷後，董玉珏避往安徽，之後長期在阜陽一帶活動，僅在名義上是豐縣縣政府和地方武裝的最高領導者，實際上很少負責具體事務，如何發展武裝力量、如何維持軍隊生存、如何進行游擊戰、如何處理與日軍和中共的關係等種種現實問題均是黃體潤在處理，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的貢獻最大。綜上所述，黃體潤在豐縣抗戰史和地方史上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是豐縣的靈魂人物。

<sup>3</sup> 《黃體潤日記》始於1933年6月，止於1949年底，其中1939年8月31日以前的部分已經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1939年9月1日之後的部分現藏于豐縣檔案館。抗戰期間黃體潤與家人、友人、上級、下屬等的信件、電報均被重新謄抄，編為《抗剿書牘》，現藏于豐縣檔案館。

<sup>4</sup> 筆者在寫作和修改本文的過程中，盡力搜尋了與豐縣和黃體潤相關的各種資料，但是仍存在兩個困難：一是現存資料總量並不多，二是部分資料帶有比較明顯的政治傾向。關於第一點，這是目前地方史研究的主要困難所在，愈是到基層就愈難獲取資料，尤其是戰亂時期，資料保存情況不佳。豐縣在抗戰中長期處於國、共、日偽激烈競爭的三角鬥爭中，基本沒有保存下檔案，報刊資料亦很少見。因此，《黃體潤日記》的價值便凸顯了出來，其填補了淪陷區的空白。關於第二點，主要是針對中共整理、編纂的資料集而言。中共方面保存了一定數量的有關豐縣及湖西地區的資料，基本涵蓋了基層、中層、高層各個層級，既有公開出版的，也有內部編印的。但這些資料大多在上世紀80年代問世，帶有比較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筆者在選用的時候非常審慎。此外，黃體潤等赴臺的豐縣籍人士成立了豐縣旅臺同鄉聯誼會，編輯出版了《豐縣文獻》，共35期，以回憶資料為主，也存在立場上的傾向性，為客觀起見，筆者沒有廣泛引用。

<sup>5</sup> 本文使用的「縣域社會」，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在本文中主要有三方面的意涵：一是指地理範圍，以一個縣的行政區域為限，其邊界是明確、固定的；二是指行政層級，以縣級黨、政、軍機構及其活動為主要研究對象，兼及縣以下的「區—鄉鎮—保—甲」行政體系。因此，「縣域社會」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可以理解為歷史事件發生和產生影響的「空間」，這個「空間」介於高層和基層之間，是在一個縣的範圍內發生的種種重要事件，並對該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影響，塑造了該縣的歷史面貌。

## 貳、「統一戰線」：脆弱的合作（1937.8-1939.8）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在進行軍事部署的同時，將後方動員作為軍事準備的重要內容。根據國民黨中常會的決議，江蘇省政府宣佈進入「非常時期」，實行戰時縣政方針，運用一切有效方法發動全部人力、物力支援抗戰。<sup>6</sup> 在上級軍政部門的佈置和要求下，豐縣開始了抗戰動員。徐州會戰爆發前，豐縣在徵募物力、人力和財力幾個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為適應戰時需要，省政府要求各縣加緊訓練壯丁，編組義勇壯丁隊，負責維護地方秩序，增強自衛能力。豐縣在 1936 年即開始訓練壯丁，至七七事變前已訓練了五期，形成了一定規模。<sup>7</sup> 黃體潤將增強義勇壯丁隊武力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他強調「對於義勇壯丁隊之訓練組織要嚴密認真。」<sup>8</sup> 黃體潤有著更長遠的打算：萬一豐縣淪陷，義勇壯丁隊要能進行游擊戰。<sup>9</sup> 1937 年十二月初，義勇壯丁常備隊初具規模，至 1938 年一月，豐縣已組織起壯丁四百人左右，編為豐縣常備隊。

中共也參與到了抗戰動員中，其重視各級統一戰線的建立，以抗日口號團結地方上層人士，減少或避免在動員和組織農民，建立農會、民兵、政權和黨的基層組織過程中的阻擾。<sup>10</sup> 豐縣統一戰線的形成，既受戰爭形勢的影響，也與人情政治有關。1935 年二月上旬，中共蘇魯邊區臨時特委成立，郭子化任書記，徐屬各縣相繼建立起區委或支部。七七事變後，在延安學習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的郭子化回到蘇北，傳達了抗日要求：一是擴大城市和鄉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二是充分利用上層統戰關係開展對工農群眾的宣傳教育，發動人民抗日運動；三是組織發動抗日武裝力量，開展游擊戰爭。<sup>11</sup> 為了將統一戰線的構想落實下來，郭子化在第五戰區上層利用人情和人事進行工作，通過與李宗仁接觸，使中共人士加入了第五

<sup>6</sup> 〈第六屆江蘇省政府委員會會議記錄（第 922 次會議，1937 年 8 月 10 日）〉，江蘇省檔案館藏，1001-甲-301。

<sup>7</sup> 蘇明，〈豐縣舉辦壯丁訓練的經過〉，《江蘇時事月刊》，第 5 期（1937），頁 22。

<sup>8</sup> 《日記》，1937 年 8 月 24 日，第 4 冊，頁 274。

<sup>9</sup> 《日記》，1937 年 10 月 13 日，第 4 冊，頁 362-363。

<sup>10</sup>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參·全民抗戰》（臺北：國史館，2015），頁 123。

<sup>11</sup> 中共徐州市委黨史辦公室編，《徐州黨史資料·第十輯》（內部資料，1986），頁 6。所謂「內部資料」為中國大陸獨有的特殊出版物，由各級黨委或政協下屬的黨史研究機構編寫，再由編寫機構委託印刷廠印刷，由於不公開出版，故無出版社和書號，本文出現的「內部資料」皆為此性質。

戰區總動員委員會，為中共開展統戰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sup>12</sup> 依托總動員委員會，蘇魯邊區二十多個縣的動委會指導員絕大部分由共產黨員或傾向共產黨的「進步人士」擔任，他們負責動委會的實際工作。<sup>13</sup> 中共的「統戰」意圖，通過各縣動委會可以一直貫徹到區、鄉、保。<sup>14</sup>

在縣、區、鄉開展工作，人情是重要因素。李貞乾，豐縣地方黨政首腦之一，歷任豐縣中學校長、教育局局長、豐縣黨部執行委員等重要職務，在豐縣教育界很有名望。1935 年左右，在中共黨員孫叔平的影響下，李貞乾與中共的關係日益密切，是中共的重點聯絡對象。<sup>15</sup> 中共在豐縣中學舉行農民抗日訓練班、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離不開李的支持。李貞乾與黃體潤是多年摯友，黃曾稱「貞乾與余最稱莫逆」<sup>16</sup>，他對李十分信任和倚重，得知李貞乾愈加傾向中共後，黃體潤表示理解：「自抗戰開始後，共產份子即在縣積極活動，貞乾因受共產重要份子孫叔平薰陶，早經加入，其最近所主張之縣事，皆共產黨所主張者也。余以共產黨徒多半吃苦耐勞，接近民眾，確較現在黨政工作人員作為積極，亦頗同情。」<sup>17</sup> 李貞乾與董玉珏、董雪山、彭世亨等豐縣黨政要人關係匪淺。1937 年 12 月 29 日，豐縣成立了縣民眾動員委員會，縣長董玉珏任主任，中共豐縣縣委書記王文彬任委員，中共黨員陳籌在郭影秋的安排下任委員會秘書。<sup>18</sup> 國共合作成立的動委會既是動員機關，也發揮了統戰作用，李貞乾扮演了樞紐性角色。黃體潤先前對中共略有懷疑，李努力打消他的顧慮：「共產黨在豐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確與政府合作，並無反政府抗日等事。」<sup>19</sup>

中共認為，動委會的建立標誌著統一戰線在豐縣的形成，使其獲得了實際上的合法化地位。為了能夠切實推進動員工作，河南省委指示蘇魯特委「應當依據廣泛

<sup>12</sup> 〈郭影秋同志談抗戰初期黨在徐州地區的統戰工作〉，徐州市歷史編寫辦公室編，《徐州史料·第三輯·黨史資料專刊》（內部資料，1982），頁 23。

<sup>13</sup> 本書編寫組，《中共湖西地區黨史文稿》（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頁 51。

<sup>14</sup> 郭影秋，〈抗戰初期黨在徐州地區的統戰工作〉，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江蘇革命史史料·第八輯》（內部資料，1983），頁 96。

<sup>15</sup> 李宗元，〈李貞乾傳略〉，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冀魯豫小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湖西地區專輯》（內部資料，1994），頁 188。

<sup>16</sup> 《日記》，1934 年 9 月 5 日，第 1 冊，頁 450。

<sup>17</sup> 《日記》，1938 年 3 月 5 日，第 5 冊，頁 91-92。

<sup>18</sup> 中共豐縣縣委黨史辦公室、豐縣檔案局編，《豐縣革命史料選·第五期》（內部資料，1986），頁 10-11。

<sup>19</sup> 《日記》，1938 年 3 月 6 日，第 5 冊，頁 92。

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把廣大民眾組織起來」「應當更多的採用合法鬥爭的形勢。」<sup>20</sup> 蘇魯特委也認為鞏固統一戰線不僅需要中共靈活與正確的運用策略，亦需獲取國民黨的信任，「目前注意的是如何實際幫助他們動員起來抗日，才不會使他們對我們失望而懷疑遠避。」<sup>21</sup> 中共通過動委會將普通民眾發動了起來，婦女訓練班、農民訓練班和農民幹部訓練班相繼成立。這些民眾團體發揮了組織群眾、宣傳抗日思想的作用，中共借此培養了不少基層幹部。<sup>22</sup> 民眾團體時常邀請黃體潤參觀、訓話和講課，得到了黃的支持和讚賞，「近日用抗日救國、抗日自衛兩口號聯絡有血性之青年及一般民眾，頗有成績，豐縣事尚大有可為也。」<sup>23</sup> 他對縣府同事稱讚說：「共產黨徒，吃苦耐勞，與其聯絡民眾，遇事有辦法，不消極之精神，頗為可佩。」<sup>24</sup> 在日記中也寫道：「聞而去訓練之農民，抗日情緒極高漲，共產黨徒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之方法，頗足為法也。」<sup>25</sup>

中共還積極成立自己的武裝力量。「自時局緊張，吾縣公務人員逃亡外方及鄉下者，幾占十分之七八」，<sup>26</sup>基層行政體系的空虛為中共發展勢力提供了機會。1937年底，豐縣縣委決定以個別重點村為中心開展軍政訓練，借助地主武裝組織游擊隊。1938年2月20日，縣動委會舉行會議，作出「派幹部下鄉協助各區組織抗日自衛隊；培訓抗日幹部；抓緊軍、警、壯丁的政訓工作」的決定。<sup>27</sup> 實際上，在一致抗日的名義下，國共均在各區鄉鎮發展實力。4月28日，縣動委會改組，李貞乾擔任組織股長，更便於利用這一組織擴充中共的力量，五月中旬，他成立了「豐縣抗日游擊隊」，擔任隊長。<sup>28</sup> 黃體潤將中共的隊伍看作是通力合作的友軍，他常告誡下屬要聯絡友軍：「值此國難嚴重，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惟有本民族統一戰線去努力，分崩離析、衝突摩擦，皆自取滅亡之道也。」<sup>29</sup>

<sup>20</sup> 〈河南省委給蘇魯特委的一封信——關於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及工人工作的指示（1938年1月19日）〉，《徐州黨史資料·第十輯》，頁141-143。

<sup>21</sup> 〈李遜關於蘇魯邊特委工作情形給長江局的信（1938年2月18日）〉，本書編寫組、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31。

<sup>22</sup> 《豐縣革命史料選·第五期》，頁16。

<sup>23</sup> 《日記》，1938年1月18日，第5冊，頁24。

<sup>24</sup> 《日記》，1938年2月12日，第5冊，頁65。

<sup>25</sup> 《日記》，1938年3月25日，第5冊，頁129。

<sup>26</sup> 《日記》，1938年2月12日，第5冊，頁65。

<sup>27</sup> 《豐縣革命史料選·第五期》，頁13。

<sup>28</sup> 《豐縣革命史料選·第五期》，頁17-18。

<sup>29</sup> 《日記》，1935年4月7日，第5冊，頁158。

中共在豐縣進行的各種活動離不開黃體潤的支持與合作，既有人情的因素，也與黃體潤的品格有關。全面抗戰爆發後，黃表現出了堅定的抗日信念，將民族和國家大義放在首要位置，面對民族危機，他意識到「抗日力量應當聯合起來，時迫事急，不可內部再生摩擦」，<sup>30</sup>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寫道：「時事艱危，自當本精誠團結、共禦外侮之旨，和洽內外，團結朝野，共同維持縣局，渡此難關。」<sup>31</sup> 這種超越黨派分歧的認識與中共主張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契合，為共同合作奠定了基礎。黃體潤對中共的態度由懷疑轉向不排斥，李貞乾與他的友情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個人情感上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他對中共的不認同，促使他願意瞭解中共的情況並發現中共的優勢所在。比如組織民眾、發動游擊戰是李貞乾介紹給他的，知曉「游擊戰」的概念後，他立刻閱讀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記》一書，瞭解到紅軍的「三項紀律，八項注意」和基本宗旨，感慨道：「閱此則知紅軍能取得民眾歡迎，故雖經國軍五次圍剿，終能脫險而出，到達陝北，致有今日第八路軍之地位。」<sup>32</sup>

1938年5月17日，豐縣縣城淪陷，常備隊被擊潰，董玉珏和黃體潤帶領殘餘隊伍分頭避往鄉下。六月初，縣政府的幾位骨幹與黃體潤會合，商討重建隊伍之事。<sup>33</sup> 六月中旬，李貞乾率領游擊隊回駐豐縣南郊，宣佈成立人民抗日義勇隊，共二百五十餘人，李任隊長。<sup>34</sup> 他邀請黃共商豐、沛、魚三縣聯防事宜。中共為了統一湖西地區的抗日武裝，<sup>35</sup>調集豐、沛、蕭、碭、魚、金、單等地的抗日武裝在豐東南會師，成立總部，合編為「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李貞乾升任總隊長，指揮蘇魯

<sup>30</sup> 《日記》，1938年3月6日，第5冊，頁93。

<sup>31</sup> 〈覆馮允齋先生（1938年4月11日）〉，《抗繳書牘》（手稿本），豐縣檔案館藏，102-1-178。下文不再注明館藏地，僅標明信件名稱和日期。

<sup>32</sup> 《日記》，1938年2月9日，第5冊，頁62。

<sup>33</sup> 《日記》，1938年6月2日，第5冊，頁229。

<sup>34</sup> 繆欣然，〈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概述〉，中共豐縣縣委黨史辦公室、豐縣檔案局編，《豐縣革命史料選·第八期》（內部資料，1988年），頁122。

<sup>35</sup> 「湖西地區」是本文較常使用的概念，有必要對其地理範圍進行簡要介紹。湖西地區地處蘇魯豫皖四省交界地帶，指蘇北、魯西南的南陽、獨山、昭陽、微山四湖以西地區，東抵津浦鐵路，西至荷（澤）商（丘）公路，南起隴海鐵路，北達濟（寧）荷（澤）一線。所轄地區有蘇魯豫皖四省邊界地區的豐縣、沛縣、銅北、嘉祥、魚台、金鄉、單縣、成武、巨野、定陶、曹縣、蕭宿永中心縣、碭山等二十餘縣。東西南北長寬皆百餘里，人口約三百五十萬。湖西既是南北通衢之區，又是四塞八抵之域，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馮治，〈湖西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及其特點〉，中共豐縣縣委黨史辦公室、豐縣檔案局編，《豐縣革命史料選·第六期》（內部資料，1986），頁125-126。



各縣聯軍。<sup>36</sup> 此時李部是該地區實力最強的抗日隊伍。為了團結抗日力量，李貞乾主動聯繫並給予黃體潤諸多幫助，黃對李十分倚靠。6月22日，豐縣常備隊整編完成，分四個中隊，共計三百九十七人。<sup>37</sup> 雖然編制和規模初具，但組織、紀律和戰鬥力均未步入正軌，縣政也陷於停滯狀態，黃體潤幾乎「諸事須與（指李貞乾）商酌也」，以貞乾之意見為意見。<sup>38</sup> 8月3日，蘇魯邊區聯防自衛辦事處執行委員會在沛縣馬莊開會，到有豐、沛、魚三縣代表，會議決定組織抗日聯軍，李貞乾任總司令。<sup>39</sup>

在黃體潤的認知中，私情與公義是交織在一起的，很難分清二者的界線。例如他見義勇隊二總隊紀律嚴明，人民讚不絕口，認為「足為吾軍之模範也，」<sup>40</sup> 並感慨「貞乾聲譽日著，得此友朋，亦頗引為慶倖者也。」<sup>41</sup> 王獻臣公開投日後，<sup>42</sup> 聯防軍在九月初發起第一次討王戰役，因各部配合不當，未取得徹底勝利，王部大營被抗日義勇隊攻破。聞此消息後，黃體潤先是不勝欣喜，後又「極為難過」，因「我軍既不能積極進攻，又不能牽制敵人兵力，坐視友軍不顧，為公為私，均覺愧對故人。」<sup>43</sup> 中共黨史將此次戰役作戰不利的原因歸結為「豐沛等縣國民黨為保存實力，戰鬥不力」，<sup>44</sup> 這樣的評判有失公允，於公於私，黃體潤均不會袖手旁觀。

第一次討王戰役後，王獻臣積極與駐徐日軍暗中聯絡，試圖獲得援助。1938年十一月上旬，李貞乾、黃體潤、董玉珏等舉行會議，共商禦敵除奸計劃，決定敵人如再來犯，各部隊應相機襲擊，相互救援。<sup>45</sup> 自12月12日起，王獻臣夥同日軍大規模進攻義勇隊和常備隊駐地，由於日偽擁有坦克和迫擊炮，火力占優勢，常備隊損失甚重。<sup>46</sup> 12月27日，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在彭明治、吳法憲的帶領下抵達豐單邊境。黃體潤得知消息後，連夜趕赴單縣會晤彭明治，將日偽兵力、

<sup>36</sup> 《豐縣革命史料選·第六期》，頁21。

<sup>37</sup> 《日記》，1938年6月22日，第5冊，頁252。

<sup>38</sup> 《日記》，1938年9月6日，第5冊，頁362。

<sup>39</sup> 《日記》，1938年8月3日，第5冊，頁317。

<sup>40</sup> 《日記》，1938年6月24日，第5冊，頁261。

<sup>41</sup> 《日記》，1938年8月10日，第5冊，頁326。

<sup>42</sup> 王獻臣系舊軍閥，北伐戰敗後下野回鄉。1938年八月底，王被日方任命為蘇北警防司令，後又擔任偽豐縣縣長。江蘇省豐縣縣誌辦公室、檔案局合修，《豐縣簡志》（內部發行，1986），頁393。

<sup>43</sup> 《日記》，1938年9月4日，第5冊，頁358-359。

<sup>44</sup> 徐州市史志辦公室編，《中國共產黨徐州地方史》，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199。

<sup>45</sup> 《日記》，1938年11月12日，第6冊，頁30-31。

<sup>46</sup> 《日記》，1938年12月12日，第6冊，頁74-75。

駐紮地點及半月來作戰情形詳為報告，雙方決定由八路軍主力進攻敵人，常備隊配合。<sup>47</sup>翌日，對王部的總攻獲得重大勝利。黃體潤認為「八路軍勇敢善戰及武器優良」、「配合適當，數路進攻」是勝利的重要原因。<sup>48</sup>

彭明治團來到湖西地區是為了打通華北與華中、魯南與蘇北的聯繫。此次給予日偽軍沉重打擊，大大緩解了豐沛等縣的困難局面，解救了各縣的國民黨地方武裝，也為中共在此立足、擴張勢力、開闢根據地奠定了基礎。彭團到達後，與李貞乾部合編為八路軍蘇魯豫支隊，並著力維持與各縣國民黨地方武裝的友好關係。1939年一月，豐、沛、單、魚、碭五縣抗日負責人在豐北吳莊召開會議，成立蘇魯豫皖邊區聯合抗日後方司令部，李貞乾任司令員。同時還成立了五縣聯合抗日後方辦事處，李貞乾任主任。<sup>49</sup>如果說之前黃體潤與李貞乾的合作是建立在友情和公義相結合的基礎上，那麼彭明治與黃體潤的合作則要複雜一些，雙方確實出於共同抗日的目的，但也糾纏著一些現實性的考量。彭明治部進入湖西地區，不僅長途奔徙，與日偽軍作戰還損失了不少人員和物資，故彭請縣府幫忙籌辦給養、予以接濟。<sup>50</sup>除提供糧食、子彈外，豐縣還幫助蘇魯豫支隊向全縣募捐兵餉兩萬元。<sup>51</sup>另一方面，彭明治協助黃體潤將豐縣常備隊改編為豐縣抗日義勇常備總隊，下轄四個大隊，完善了編制。<sup>52</sup>豐常與蘇魯豫支隊在防務上密切協作，協同駐防；在作戰上共商部署，相互配合。<sup>53</sup>每次分防黃體潤均遵循彭明治的意見，並根據彭的駐地選擇自己的駐地，「好與八路軍取聯絡也」<sup>54</sup>。

最觸動黃體潤的是八路軍的優良作風，他在紀律、組織、政訓和游擊策略方面受益頗多。黃體潤多次公開呼籲豐常官兵應向八路軍學習，「八路軍勇敢善戰，其官兵服從命令，嚴守紀律，及奮鬥犧牲之精神，我們均要切實去學。」<sup>55</sup>為改善豐

<sup>47</sup> 《日記》，1938年12月28日，第6冊，頁99-100。

<sup>48</sup> 《日記》，1938年12月29日，第6冊，頁103。

<sup>49</sup> 《豐縣革命史料選·第五期》，頁34-35。

<sup>50</sup> 《日記》，1939年1月3日，第6冊，頁112。

<sup>51</sup> 《豐縣革命史料選·第五期》，頁33。

<sup>52</sup> 常備總隊由縣長董玉珏任總隊長，黃體潤任副總隊長，是實際的領導者。《日記》，1939年1月8日，第6冊，頁116-117。下文簡稱為「豐常」。

<sup>53</sup> 《日記》，1939年1月30日，第6冊，頁138-139。

<sup>54</sup> 《日記》，1939年1月15日，第6冊，頁124。

<sup>55</sup> 《日記》，1939年1月2日，第6冊，頁110。

常的諸多缺點，他請蘇魯豫支隊幫助訓練豐常，向蘇魯豫支隊聘請教官。<sup>56</sup> 黃體潤對游擊戰的認識也有了提升。在八路軍到來之前，他雖然時常提起游擊戰，但對如何游擊似懂非懂，不得要領，作戰時固守正面進攻的老套路，無法取得優勢。1939年2月20日，彭向黃建議：「我國是持久抗戰，與日偽作戰時要保全實力，不可輕易犧牲，要抓著時機，打擊敵人。」<sup>57</sup> 這段時間黃體潤經常拜訪彭明治、郭影秋等人，多次會談加深了他對游擊戰的認識，帶給他很大啟發。

這一時期國共關係進入比較平穩的合作期，雙方取得了良好的合作成果。黃體潤聘請原任中共豐縣縣委書記王文彬擔任縣府第一科科長，請其負責民眾運動工作。1939年7月22日，黃體潤刻制了新印章，外面書「蘇」字，裡面書「蘇魯豫邊區抗日聯軍。」<sup>58</sup> 可見他對雙方合作關係的認同。中共對此也持肯定態度：「1937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後，至1939年上半年是豐縣共產黨同國民黨關係較好，統一戰線從形成到發展並較為穩固的一段時間，因而全縣抗日局面也是比較好的。」<sup>59</sup> 1939年1月11日，黃體潤與魚台縣縣長朱啟森商談兩縣互相協助、團結抗日的問題，朱發表防止共產黨活動言論頗多，黃體潤則認為「在國難嚴重期間，應當不分黨派宗教，大家一致團結起來抗日。」<sup>60</sup> 周邊縣份的國民黨軍政領導對中共在此駐足、發展實力多有指摘，黃體潤均有耳聞，這些細節揭示出蘇魯地區的國共合作並不穩固。

實際上，「統一戰線」這一概念帶有比較濃厚的「中共色彩」，此時豐縣的國共關係用「脆弱的合作」來形容或許比較合適，雖然不能否認雙方的抗日意願，但這種合作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基礎上的，是生存需求與人情紐帶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國共實力均不如日偽時「抱團取暖」式的權宜之計。黃體潤的信任與支持客觀上幫助蘇魯豫支隊在湖西地區站穩了腳跟，在國民黨的地方軍政組織中安插進了幹部，並贏得了軍民的認同。蘇魯豫支隊協助黃體潤打擊日偽軍、幫助其改善軍隊編制、提升作戰水平，有助於維持國民黨地方政權的生存。然而，一旦環境發生變動或雙方實力改變，這種短暫的聯合很快便會瓦解。

<sup>56</sup> 《日記》，1939年2月23日，第6冊，頁163-165。

<sup>57</sup> 《日記》，1939年2月20日，第6冊，頁160。

<sup>58</sup> 《日記》，1939年7月22日，第6冊，頁396。

<sup>59</sup> 《豐縣革命史料選·第六期》，頁52。

<sup>60</sup> 《日記》，1939年1月11日，第6冊，頁119。

## 參、破裂：從湖西「肅托」到「六·一四」事變 (1939.9-1940.6)

1939年八月，湖西「肅托」發生，國共關係逐漸出現裂痕，最後以徹底決裂告終。豐縣國共關係的走向，既受當時大的歷史環境的影響，也與湖西地區的小環境緊密相關，黃體潤與李貞乾的關係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

### 一、大小環境的交織

1938年十月，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中共勢力的坐大引起了國民黨的擔憂，促使其轉變對共政策。1939年一月下旬，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這次會議重申了抗戰到底的總體原則，同時將整頓黨務作為重點內容。蔣介石在對中共的態度上指出：「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不要縱容他，不必害怕他，更不好利用他……我們大黨對小黨要有嚴正的態度、鮮明的立場，用政治方法去融化他、感動他，使趨於一致。」<sup>61</sup> 蔣要求國民黨要對中共問題有確切的認識與適當的處理。1939年春，國民黨內部先後制定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重要文件，要求黨政軍民各級組織務必在所有地區全面恢復和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大致與此同時，河北、山東等地國共的軍事摩擦加劇，衝突不斷。種種跡象表明，自1938年末開始，國共關係正在出現嚴重危機。

國民黨高層試圖限制中共發展的意圖傳遞到了蘇魯邊區。1939年4月4日，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董鐸到達蘇北，召集各縣縣長傳達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的決議。5月15日，董鐸向豐縣軍政幹部報告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意義與組織，並委任黃體潤為組織豐縣三青团籌備員。接下來兩個月裡，上級軍政官長多次來豐指導組建三青团。上峰的頻繁活動促使黃體潤重視起三青团的工作，在常備隊各隊建立起三青团組織，號召隊員加入。8月16日，豐常召開團員大會，黃體潤向他們訓話，摘述了蔣介石的《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青年書》，詳細講述了團章中對三民主義

<sup>61</sup> 張世瑛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2·補編（民國28年1月至6月）》（臺北：國史館，2015），頁167-171。

信仰的規定。<sup>62</sup> 8月29日，縣黨部開辦了三青團團員訓練班，黃體潤親自擔任校長並講授《抗戰言論》課程。<sup>63</sup> 從豐常的發展歷史看，這樣的舉動很不尋常，豐常自成立時就不見國民黨黨組織的蹤影，除抗日剿匪外幾乎不宣傳政治信仰和黨派立場，黃體潤的數次訓話中連三民主義都極少出現，如今他對三青團如此重視，是開始強化豐常的政治信仰的表現。

中共在豐縣周邊的所作所為也讓黃體潤懷疑其真實企圖。1939年9月5日，山東單縣黨務指導員朱育才來晤黃體潤，朱告訴黃除魚台縣外，山東有數縣縣長槍支都被中共收繳，中共與山東國軍衝突頗大。<sup>64</sup> 此時國共雙方在山東確實發生了多起摩擦。朱育才在單縣很有名望，是國民黨的地方領袖，中共對其評價頗高，認為他思想「進步」，是重要的「統戰對象」。<sup>65</sup> 連他都對中共頗有微詞，黃體潤認為朱的話並非虛構，他感慨道：「同是抗日部隊，同是黃帝子孫，同是中國人民，在此外禍嚴重，危急存亡之秋，終日高唱統一戰線，而竟為擴充己黨勢力，不顧一切，倒行逆施，破壞團結，誠令人憤慨不已也。」<sup>66</sup> 這是黃體潤未曾有過的嚴重表態。翌日，蘇魯豫支隊後方辦事處統戰部長王文彬來豐晤黃，似有安撫之意，表示「對於團結抗戰，兩方意見頗為接近」，但黃有些踟躕，「未知將來能做到若何地步也。」<sup>67</sup>

上述幾件事是在國共關係面臨政治和軍事雙重考驗的大環境，與湖西地區摩擦加劇的小環境相互結合的背景下發生的，揭示出雙方的合作已經發生了變化。

## 二、湖西「肅托」及其影響

1939年八月至十一月，湖西地區發生了「肅托事件」，這是一起在中共全黨有著重大影響的慘案，中共官方將其定性為「一樁重大的冤假錯案」，用「駭人聽聞」

<sup>62</sup> 《日記》，1939年8月16日，第6冊，頁430-431。

<sup>63</sup> 《日記》，1939年8月29日，第6冊，頁453。

<sup>64</sup> 《日記》手稿本，1939年9月5日，豐縣檔案館藏。1939年9月1日之後的黃體潤日記迄今未公開出版，且無編寫頁碼，故無法精確標註。本文引用的內容來自豐縣檔案館所藏的手稿本，下文不再注明收藏地和頁碼，僅標明日期。

<sup>65</sup> 張慶釗，〈單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冀魯豫小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第二十一集》（內部資料，1996），頁33。正是因為中共份子與朱育才建立了良好的統戰關係，單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得以建立。李毅，〈抗戰初期中共單縣縣委工作的幾點回憶〉，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研究會編，《冀魯豫黨史研究資料·第七輯》（內部資料，1995），頁47。

<sup>66</sup> 《日記》，1939年9月5日。

<sup>67</sup> 《日記》，1939年9月6日。

來形容，並稱「其造成的損失及其危害是相當嚴重的，教訓是及其慘痛的。」<sup>68</sup> 此次事件起因於湖邊地委幹校，該學校是湖邊地委為了培養幹部於 1939 年五月創辦的，學員都是由各地來的知識青年，日常工作由教員魏定遠負責。八月，在臨近分配之際，部分學員不願留在湖邊工作，且成立了「同鄉會」組織，魏定遠對學員的訴求持同情態度。這種不服從分配的情況令地委負責人如臨大敵。<sup>69</sup> 處理此事的組織部長王須仁認為是魏定遠通過同鄉會煽動學員回鄉，他用嚴刑拷打迫使魏招認參加了托派組織。<sup>70</sup> 王須仁的作法得到了蘇魯豫邊區區委書記白子明和蘇魯豫支隊第四大隊政委王鳳鳴的支持，認為湖西地區確實存在托派組織，遂開展了大規模的「肅托」運動，大肆殘殺幹部。中共官方在敘述此事時，大多將責任歸結為王須仁、王鳳鳴、白子明等發動者的個人原因，認為二王試圖借「肅托」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白子明立場不堅定、不作調查研究。<sup>71</sup> 根據學者最新的研究，湖西「肅托」實際上是由中共內部的幹部矛盾引發的，湖西地區處於蘇魯豫皖四省交界地帶，幹部來源多樣，矛盾衝突在所難免，知識分子新幹部與工農老幹部、外省幹部與山東本省幹部、黨政幹部與軍隊幹部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再加上大量的私人恩怨，最終釀成了這樣一起嚴酷事件。<sup>72</sup>

1939 年 9 月 19 日，黃體潤聽聞八路軍後方辦事處內部傾軋益烈，有四十餘幹部因「托匪」嫌疑被槍決。接下來幾日又相繼傳來各種消息，莫衷一是。黃體潤起初以旁觀者自居，認為或存有內幕，究竟如何局外人無從知曉。<sup>73</sup> 但他對這一事件秉持著一個基本看法：被槍決者均是湖西各縣抗日幹部，不無微勞，「今竟藉口托匪罪名，施以毒手，使一般青年聞之，不無寒心之處。」<sup>74</sup> 八路軍槍殺幹部，自毀長城，於抗日無益。9 月 30 日，江蘇省民政廳廳長王公瓚致信黃體潤，想必王也已知道湖西肅托之事，信中寫道：「貞乾入歧途（謂加入共產黨）不知有新覺悟否？至

<sup>68</sup> 《中共湖西地區黨史文稿》，頁 89。

<sup>69</sup> 中共碭山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湖西「肅托事件」研究》（內部資料，2005），頁 6。

<sup>70</sup> 劉居英，〈關於蘇魯豫邊區肅托鬥爭的總結報告（1940 年 6 月）〉，袁玉驤主編，《湖西「肅托」始末》（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頁 113。

<sup>71</sup> 《中共湖西地區黨史文稿》，頁 90-91。

<sup>72</sup> 有關湖西「肅托」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參見郭寧，〈走向一元化：抗戰時期中共山東武裝力量的整合〉（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頁 123-147。

<sup>73</sup> 《日記》，1939 年 9 月 23、24 日。

<sup>74</sup> 《日記》，1939 年 9 月 23 日。

念，果有回頭趨勢，尚望進言，不以抗戰為第一義，投機取巧，擴張勢力，為國家計亦屬大損失也。」<sup>75</sup>

王的來信指明了對中共暗中擴張勢力的擔憂，「且不值共產黨之行為也。」<sup>76</sup> 10月6日，李貞乾來豐晤黃，解釋肅托之事。李言語頗樂觀，認為托匪確實存在，他們不抗日，勢力頗大，經過槍決八十餘人，勢力已日漸減削。<sup>77</sup> 黃體潤形容與李貞乾的會面「晤談極歡」，但並未緩解其擔憂，勸解李之事亦無眉目。10月10日，他在給縣長董玉珪的信中寫道：「八路軍距吾軍駐地甚近，對我似有防範之意，如此情形，何能一塊作戰？」<sup>78</sup> 他對中共已漸失信任。

1939年十月下旬，肅托已呈失控狀態，李貞乾被逮捕並遭受了三次刑訊逼供。<sup>79</sup> 10月27日傍晚，黃體潤得悉李貞乾被「誣為托匪，氣絕三次，懸樑自盡，又被救活」的消息，好友慘遭非刑，黃體潤不勝憤懣，他在日記中寫道：

按貞乾自脫離國民黨加入共產黨，聯絡青年，抗戰以來，行將兩載，心力交瘁，陳莊一役，兩弟殉難，全家被虜，房屋焚燒殆盡，其父母妻子後隨脫險，然各處流離，幾乎無以糊口，此人方以滿門忠義稱之。不料奸人竟以勾結日寇，擬用托匪二字冤殺之，公理正義之謂何也？<sup>80</sup>

黃體潤對肅托的內情並不瞭解，也不清楚中共湖西地方黨內部的恩怨和爭鬥，他對托匪的認知完全來自月初與李貞乾的談話，以抗日與否來評判肅托的正當性，李貞乾為豐縣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遭受如此酷刑顯然不合理。翌日，單縣友人來信，告訴了黃體潤一些新情況，消息真假難辨，但帶給了他非常危險的信號：中共不僅在內部殘殺抗日幹部，還企圖吞併國民黨地方武裝，對內對外都行破壞抗日之事，「覺八路軍之殘忍與不顧信義，不僅為我良友憤慨，且為國家民族前途憂也。」<sup>81</sup> 黃的感受是他長期以來對中共的真實看法，是李貞乾的友情和抗日的民族大義讓他與中共走在了一起，友情與國家是一內一外兩個紐帶，一旦友人受迫害、抗日被破

<sup>75</sup> 〈王公璵來信（1939年9月30日）〉。

<sup>76</sup> 《日記》，1939年9月30日。

<sup>77</sup> 《日記》，1939年10月6日。

<sup>78</sup> 〈致信縣長董玉珪（1939年10月10日）〉。

<sup>79</sup> 張彤光、李鳳舞、孔令聞、孟靜之，〈湖西「肅托」始末〉，袁玉驥主編，《湖西「肅托」始末》，頁45-46。

<sup>80</sup> 《日記》，1939年10月27日。

<sup>81</sup> 《日記》，1939年10月28日。

壞時，對中共的態度必然動搖，他向豐常官長訓話稱：「我輩應知道共產黨八路軍之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不能一味盲從附和，尤其青年人更要注意。」<sup>82</sup>

1939年十一月初，黃體潤得知李貞乾幸未遇害，已恢復自由，「惟身體經刑訊後傷勢頗重，現正在八路軍衛生處醫治，我抗敵最堅決之良友竟為人誣陷，受此奇苦，實令人悲憤不平。」<sup>83</sup>此時中共也開始調查並糾正湖西肅托的錯誤，因此事帶來的影響極為惡劣，郭洪濤、郭子化等人走訪了碭山、豐縣等湖西各縣，向國方解釋誤會和辦理托案經過情形，「對各縣政府友軍積極表示好感，從事聯絡，一變近兩月來之威脅態度矣。」<sup>84</sup>聽到共方團結抗戰的表示後，黃近月來的疑慮略有消解：「聞此消息，不僅為良友慶，亦為國家地方前途賀也。誠以大敵當前，何容抗日部隊自行分裂，如能精誠團結，則各軍既無後顧之憂，始能一意抗戰，滅此倭寇也。」<sup>85</sup>

12月15日，李貞乾與黃體潤見面，他見李精神飽滿，不減於未受酷刑之前，感慨云：「覺此君忠黨（共產黨）愛國之精神，不時流露言表，絕不因受折磨灰心短氣，其主張國共合作與實行三民主義，尤能超出一般共產黨員之上，殊堪令人欽佩也。」<sup>86</sup>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黃體潤對中共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李貞乾的影響。翌日，黃體潤與李貞乾晤見蘇魯豫支隊長彭明治，據黃日記記載，彭「屢次約地相見」，可見中共此時頗重視國方的感受。彭明治向黃體潤表示：「此次八路軍肅托因少數人主張錯誤，致冤殺同志多人，殊為惋惜，對於八路軍與各縣關係，就抗戰上講，就私人感情上講，均有密切聯絡之必要。」黃體潤亦贊同彭之主張：「八路軍為蘇魯邊區主力，各縣仰若泰斗，嗣後應精誠團結，共禦外侮之語。」<sup>87</sup>雙方坦誠相見，看似籠罩在國共之間的陰霾已經消散。

黃體潤與中共的「和解」只是國共關係的一個側面，另一個側面揭示了其他重要因素。豐縣周邊的縣份大多對中共頗不信任，中共能夠得到黃的諒解，卻不能避免與其他縣的摩擦，他們的態度會影響到黃體潤的想法。1939年11月9日，銅山

<sup>82</sup> 《日記》，1939年10月30日。

<sup>83</sup> 《日記》，1939年11月13日。

<sup>84</sup> 《日記》，1939年11月17日。

<sup>85</sup> 《日記》，1939年11月17日。

<sup>86</sup> 《日記》，1939年12月15日。

<sup>87</sup> 《日記》，1939年12月16日。



縣軍政領袖耿繼勳派人來豐聯絡，告知黃體潤其與八路軍「已成冰炭，業有數次接觸，並互相拘捕人員」。耿畢竟是友軍，黃回信一封：「抗戰建國事業重大，吾等處此地域，處此環境，尤覺艱巨，嗣後對於一切，務取密切聯絡。」<sup>88</sup> 他實際在做兩手準備。13日，黃體潤親自去銅山拜訪耿：「（兩部）同是抗戰部隊，同隸中央政府，自當攜手。」<sup>89</sup> 相較中共，黃對耿更親近。二人會談後決定聯合碭山縣長竇雪岩、沛縣縣長馮子固聯名向徐海行署主任王公瓚致電，「說明四縣有兵力兩萬餘人，惟不能統一指揮，故各自為政，近八路軍在此區域積極擴充勢力，大有取各縣而代之勢，如長此下去，必被人各個擊破，四縣鑒於環境險惡，特電請王主任來北主持，並向中央請求名義統一軍權，以利抗戰，而便於對付野心家之八路軍等意義。」<sup>90</sup>

湖西肅托對中共在湖西地區的發展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就其內部而言，造成了黨政軍民幹部約二百餘人被屠殺，地方武裝連以上幹部被殺光，士兵大量逃亡。<sup>91</sup> 對其外部環境而言，日軍趁機進行了冬季「掃蕩」，不少地方勢力轉而靠近國軍，除黃體潤外，沛縣的馮子固部、碭山縣的竇雪岩部、單縣的劉耀庭部等均轉變對中共的態度，紛紛與之疏遠。<sup>92</sup> 負責處理湖西肅托的羅榮桓在總結此事的經驗教訓時說：「統一戰線受到部分的損失，影響到同情者對我們的疏遠，同情者與我們之間造成了一些裂痕，摩擦問題將更嚴重。」<sup>93</sup> 中共在湖西肅托中表現出來的殘忍與血腥，影響了對其友好人士的態度，也為原本就反共之人提供了口實，導致國共關係受到嚴重挫傷，加深了雙方的隔閡。

### 三、國共組織分割與關係破裂

1939年末，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後，限共由政治上發展到以軍事防共為主的階段。國民黨中央先後制定並下發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辦法》等秘密文件。<sup>94</sup> 在華北、山東等地，國民黨軍隊開始向中共根據地大規模進攻。進入

<sup>88</sup> 《日記》，1939年11月9日。

<sup>89</sup> 《日記》，1939年11月12日。

<sup>90</sup> 《日記》，1939年11月12日。

<sup>91</sup> 〈山東分局關於蘇魯豫邊區肅托鬥爭的總結報告（1940年6月）〉，《革命歷史檔案》，山東省檔案館藏：G001-01-0052-004。轉引自郭寧，《走向一元化：抗戰時期中共山東武裝力量的整合》，頁135。

<sup>92</sup>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240、244。

<sup>93</sup> 羅榮桓，〈「肅托」擴大化的經驗教訓（1939年12月26日）〉，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7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頁167。

<sup>94</sup> 〈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辦法〉，安徽省文物局新四軍文史徵集組編，《皖南事變資料選》

1940年，國共兩黨明顯地進入了針鋒相對的時期。一月初，江蘇省主席韓德勤致電蔣介石，彙報中共在湖西地區「藉抗敵為名盤踞蘇北豐碭沛邊境及魯屬金嘉魚各縣境，積極擴充勢力，收繳民槍，勒捐征糧，勾引地方武力，殺害官吏，占領行政系統，企圖攫奪政權，有在蘇魯豫邊區建立永久根據地模樣。」<sup>95</sup>湖西是華北與華中的聯絡樞紐，韓德勤建議蔣介石必要時可動用軍事手段。中共對此早有準備，並在對付摩擦上展現出了強硬的態度。在這一背景下，豐縣的國共關係逐漸走向徹底決裂。

1940年初，黃體潤主動採取行動將豐常與中共切割。雙方合作的時候共同組建了一些機構，豐縣政府和豐常也聘請中共人士做幹部。1月9日，黃體潤決定將豐常政訓處主任王效斌調離，王是黃體潤的內侄，黃對其非常扶持，曾接濟學費和生活費，並送其去延安抗大讀書。黃體潤認為：「王效斌作事雖積極，但其系共產黨重要黨員，信仰共產主義，本隊原系國民黨領導之部隊，對信仰不同之官長，未便委以要職，以免軍心信仰不堅，故將其調任秘書，所遺主任一職，另委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程守祥擔任。」<sup>96</sup>從這番表白看，將王調離是因為黨派原故，另委三青团團員擔任政訓處主任，強化意識形態的目的顯而易見。在黃體潤看來，即便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部隊後也應該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能暗自做有悖組織之事。黃體潤對中共在豐常內部的活動早有察覺，聘請中共軍政幹部進入豐常為中共發展黨員、改造豐常提供了合法的條件，中共在豐常秘密建立了以王效斌為書記的中共黨團，黨員發展到200餘人。<sup>97</sup>除在豐常內，依託于區鄉政權和組織，至1939年八月，豐縣的中共黨員發展到1980人。<sup>98</sup>中共的迅速發展顯然觸犯了黃體潤的禁忌。翌日，王效斌脫離豐常而去，黃表示：「以其信仰，既與本黨不同，將來決難合作，與其決裂於後，不如此時令其去。」<sup>99</sup>日漸隔閡的兩黨，繼續合作的前景並不樂觀。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頁382-386。

<sup>95</sup> 〈韓德勤電蔣中正（1940年1月3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國史館藏，002-090300-00219-012。

<sup>96</sup> 《日記》，1940年1月9日。

<sup>97</sup> 〈抗日戰爭初期徐州西北地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三輯·專題部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頁27。

<sup>98</sup> 周允華主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豐縣組織史資料（1928-1987）》（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99。

<sup>99</sup> 《日記》，1940年1月18日。

從豐常的實際動向看，黃體潤除要求部隊在駐防時對中共多加防範外，並無有敵意的表示。主要的衝突發生在中共與周邊幾個縣之間。1940年2月18日，耿繼勳來信告知蕭縣縣長彭笑千被中共驅逐，蕭縣常備隊被中共改編。<sup>100</sup> 同日，碭山縣長竇雪岩亦來信，告知碭山常備隊遭受新四軍游擊支隊襲擊，竇提醒黃：「彼等希圖打通皖北魯蘇路線之陰謀日益顯露。」<sup>101</sup> 沛縣也派人來商量對共之事。聽聞這些消息後，黃體潤認為當前局勢十分嚴峻：

八路軍藉抗戰為名，實行其擴黨擴軍攫取政權、破壞中央行政系統之陰謀。從此後，除抗日除奸外，又須防此異黨異軍矣。所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瞻望前途，真令人不寒而慄矣。<sup>102</sup>

他與豐常幹部談：「本部近來環境極為複雜，極為艱苦，前有日偽軍之進逼，後有八路軍之搗亂，而我內部帶兵軍官有思想向右之份子，右則有加入漢奸之可能，政工人員有思想向左之份子，左則有加入共產黨之可能，處此艱苦複雜之環境，吾輩惟有砥柱中流，以三民主義來號召軍民，抗戰到底，以遂我救國家救民族之初衷也。」<sup>103</sup> 這番話揭示了豐常的困境。翌日，黃體潤與沛、碭來人商定了應付中共的對策，除切實加強三縣聯絡外，還約定「如該軍對我某一縣軍隊有侵犯時，即本攻守同盟之約去抵抗」、「各縣盡力肅清內部不忠實於本軍之共產份子」等舉措。<sup>104</sup> 要旨是「對內清洗，對外求援」，但並未與中共徹底撕破臉，「對八路軍需索食糧金錢仍予以相當供給」，以示仁至義盡，避免打草驚蛇。擬定上述措施後，黃體潤代表三縣致電韓德勤，請求派軍隊來徐西坐鎮。<sup>105</sup> 在給上級的報告中，各縣情況被描述得很嚴重，涉及到國民黨縣政權和軍隊的獨立與生存。之後的一段時間，中共的越軌行為越來越多地彙集到黃體潤處，他特意召集豐常官長及政工人員訓話：

1、估計形勢對我極有利；

2、八路軍欲奪取各縣政權，收繳各縣抗日團隊槍支，已于蕭碭單三縣實行；

<sup>100</sup> 〈耿繼勳來信（1940年2月18日）〉。

<sup>101</sup> 〈碭山竇雪岩來信（1940年2月18日）〉。

<sup>102</sup> 《日記》，1940年2月18日。

<sup>103</sup> 《日記》，1940年2月28日。

<sup>104</sup> 《日記》，1940年2月29日。

<sup>105</sup> 〈黃體潤致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電（1940年2月29日）〉。

3、蕭縣縣長被逼出走，由於其平日任用之共產黨員太多，久為傀儡，礪單軍隊紀律太壞，八路乘之；

4、本部立場是受國民黨之領導，目的是保衛國家民族及桑梓，對八路軍態度是人  
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決犯人。這就是為團結而戰，為主義而戰。<sup>106</sup>

此次訓話的主旨與 1939 年完全不同，之前的基調是抗日、剿匪、除奸、自衛，現在則變成了與中共之間的信仰之戰、主義之戰。中共之罪有二：一是陰謀篡奪政權，二是破壞抗日大局，奪取國民黨政權就是在阻撓抗日。在黃體潤看來，為了抗日這一最高目的，國共之間要團結，各自的內部也要團結，中共搞肅托，是自身內部不靖；在豐常發展組織，是讓國方內部不靖；圍攻各縣軍隊，覬覦縣政權，是讓雙方關係不靖。種種疊加起來，中共自然是破壞抗戰的罪魁禍首。

這段時間中共採取如此「激進」的行為自有其原因。面對軍事摩擦，1940 年初，中共中央開始強調「對一切投降反共勢力的進攻，對一切破壞抗日根據地的陰謀，必須加以堅決的打擊。」<sup>107</sup> 在中共看來，鬥爭是為了團結而不是為了分裂。中共中央的指示傳達到了北方局和山東分局，後者對蘇魯豫地區做出了要求：「積極尋求有理有利的條件和機會，首先打擊與消滅最頑固者，以確實樹立我在該區之絕對優勢，開展魯西南，尤以蘇北各縣黨工作、政權工作與廣大發展群眾鬥爭和地方武裝……只有在統一及反摩擦鬥爭勝利下，開展該地區各方面工作。」<sup>108</sup> 站在中共的立場上，在黃體潤看來是破壞國民黨行政系統、篡奪政權的種種行為實則是為了自衛與發展採取的必要舉措。國共高層往往從抗戰的前途、軍隊的發展、自身的生存等角度考慮二者的關係，但基層的摩擦往往無法辨明究竟孰是孰非。比如 1939 年 11 月 21 日，銅山縣保安團團長耿繼勳圍攻中共銅北辦事處和獨立營，製造了「千里井慘案」。<sup>109</sup> 這是國民黨的主動攻擊行為，中共因受湖西「肅托」的影響採取了忍讓的態度。而像傾向中共的「進步人士」、蕭縣縣長彭笑千被驅逐，<sup>110</sup>則是中

<sup>106</sup> 《日記》，1940 年 3 月 10 日。

<sup>107</sup> 〈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1940 年 2 月 1 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2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 263。

<sup>108</sup> 〈山東分局關於爭取我在蘇魯豫邊優勢之方針及佈置（1940 年 2 月）〉，《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 7 卷，頁 234。

<sup>109</sup> 《中共湖西地區黨史文稿》，頁 110。

<sup>110</sup> 彭笑千本是傾向於中共的進步人士，對中共在蕭縣的發展幫助很大，彭雪峰曾親自致函表示肯定。1939

共地方黨組織在執行統一戰線時實行「左」的做法，對蕭縣的軍政組織造成了負面影響，讓周邊的國方人物抓住了把柄。<sup>111</sup> 其他各種大小衝突大致如此，主義之分、立場之別、黨派之爭，導致雙方的關係已無法挽回，黃體潤與李貞乾之間的關係也面臨考驗，1940年3月31日，李拜訪黃，雙方「暢敘甚歡，惟談至八路軍與本軍隔閡情形，不能化除，未免相對唏噓耳。」<sup>112</sup>

國共關係在1940年四、五月間急轉直下，江蘇省政府在三月下旬委任湯鐵飛任第九區專員，負責策動各縣地方武裝反共。<sup>113</sup> 五月初，蘇魯豫支隊奉令南下發展中原根據地，湖西地區暫時出現了中共軍力的空虛。趁此機會，沛、豐兩縣相繼採取行動。沛縣縣長馮子固在湯鐵飛的支持下將第五區區長、中共黨員李劍波撤職，馮採取行動後，蘇魯豫區黨委決定針鋒相對，不交權、不離職、發動群眾遊行，6月13日，遊行群眾在縣工會主席朱恒新的帶領下向馮子固請願，結果遭到武力鎮壓，朱及部分民眾被槍殺，中共稱作「六·一三」事件。<sup>114</sup> 與此同時，豐縣也將中共鄉長撤職，派豐常向豐北發展，相繼占領劉元集、趙廟、便集、鬼莊、孫莊一帶，並建築據點。<sup>115</sup> 在黃體潤看來，此舉系正當行為，但中共認為豐、沛兩縣的行為顯然是挑釁。6月10日，343旅黃河支隊進駐湖西地區，面對愈演愈烈的國共摩擦，決定先對豐常予以打擊。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豐常對中共長期發展的威脅更大，「建築據點是意圖蠶食……如不給豐縣常備隊必要的反擊，豐北抗日根據地是很難保存下來的。」<sup>116</sup> 6月14日拂曉，黃河支隊向豐常孫莊、便集、劉老莊等據點大舉進攻，此次戰事至6月16日基本結束，雙方互有損失，豐常損失

年九月，蕭縣由蘇魯豫區黨委劃歸豫皖蘇區黨委領導，1940年二月初，豫皖蘇區黨委組織部長周季方來蕭縣，指出讓一個非黨人士當縣長是右了。強令縣委於三日內接管縣府大印，換成共產黨員當縣長。彭笑千辭職後，周季方改造蕭縣政權，把全縣區長、鄉長換個遍，一些與共產黨合作的民主人士產生危機感，蕭縣常備總隊第四營營長劉瑞歧不接受縣政府領導，單獨活動。中共蕭縣縣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共產黨蕭縣地方史（1919-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138-139；吳孝桐，〈彭笑千——兩任蕭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華中抗日根據地建設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頁101。

<sup>111</sup> 〈集總關於魯西軍隊工作的指示（1940年7月24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上冊，頁318。

<sup>112</sup> 《日記》，1940年3月31日。

<sup>113</sup> 中共沛縣縣委黨史辦公室，〈抗日戰爭初期沛縣統一戰線變化概況〉，中共徐州市委黨史辦公室編，《徐州黨史資料·第九輯》（內部資料，1985），頁133。

<sup>114</sup> 江蘇省豐縣縣志辦公室編，《中共豐縣地方史（1919-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112。

<sup>115</sup> 《中共豐縣地方史（1919-1949）》，頁113-114。

<sup>116</sup> 中共豐縣縣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豐縣檔案局編，《豐縣革命史料選·第四期》（內部資料，1985），頁157。

更大，黃體潤的妻子及小女在孫莊被俘。<sup>117</sup> 豐常內部的中共份子如李旭華、李秉真、渠伯奎等均率部投共。

「六·一四」事變是豐縣抗戰史上的一次分水嶺，國共關係徹底破裂。6月18日後，黃體潤聯繫沛、碭、銅、單等縣的軍政首腦，共商聯合對共、夾擊匪軍之事。<sup>118</sup> 在此後的日記中，他皆以奸黨、奸匪或八匪來稱呼中共。這一事件引起了國民黨軍政高層的注意，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特將此事彙報給蔣介石，指出中共正積極向國方進攻。<sup>119</sup> 韓德勤也告訴蔣介石中共有赤化蘇魯皖豫、建立偽政權之野心，請蔣抽派精銳師過江增援。<sup>120</sup> 此次事變雖然對豐常造成了一些損失，規模畢竟有限，但在衛、韓等看來，卻是中共圖謀不軌的絕佳證據。

儘管黃河支隊在對豐常作戰中給予了黃體潤一定的打擊，但中共在事後評價此次戰鬥時卻並未給予肯定，而是認為：

這一時期在反頑軍事鬥爭上取得了勝利，但在鬥爭的策略上是有失誤的。有單純的軍事觀點，錯誤地選定豐縣常備隊作為打擊重點。那時朱世勤已公開通敵，而銅北耿繼勳製造「千里井慘案」有待懲罰，馮子固、黃體潤雖已向我挑釁，但蘇北頑軍與朱世勤之間也存在著利害衝突。據此暫時不打蘇北頑軍，採取集中力量打擊朱世勤部，則對我是有理、有利、有節的，而我卻先打擊「豐常」黃體潤部，因此，反而加速了蘇北頑軍與魯西南朱世勤的反共步調漸趨一致，使我處於四面對敵，分兵把口，在政治上、軍事上都非常被動的局面。根據地也日漸縮小。<sup>121</sup>

在湖西各縣，黃體潤對中共的態度已經是最友好的了，相較馮子固、耿繼勳等人，黃對合作局面的維護意識明顯更強。縱覽其日記及其採取的行動，雖然有清除中共份子的企圖，但並無軍事上的主動進攻，加強對孫莊、便集的守衛，也是為了自固，免遭共軍襲擊。黃體潤對國方主動挑起的摩擦並不支持，得知耿繼勳製造了「千里

<sup>117</sup> 《日記》，1940年6月16日。

<sup>118</sup> 《日記》，1940年6月18、19、20日。

<sup>119</sup> 〈衛立煌電蔣中正（1940年6月28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國史館藏，002-090300-002 03-012。

<sup>120</sup> 〈韓德勤電蔣中正（1940年7月15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國史館藏，002-090300-002 02-091。

<sup>121</sup> 〈蘇魯豫邊區（湖西）抗日根據地創建時期的回顧〉，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冀魯豫小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第十一集》（內部資料，1988），頁36。

井慘案」後，他評價說：「此次耿收八路軍槍支，系報復手段，同是抗戰部隊，不拿全力對外，竟而自相殘殺，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令人不勝其惋惜也。」<sup>122</sup> 正是黃河支隊的進攻，導致黃對中共的看法徹底轉變，中共竟然將一位最溫和、最友好的合作者趕到了自己的對立面，不得不說是失策。

中共湖西地區黨組織很快意識到自己的做法帶來了嚴重後果，立刻採取補救措施。6月22日，黃體潤的妻女被釋放，並帶回八路軍後方司令部統戰部長郭影秋來信，信中說：「此次事變，當由特工湯敬負責，兄等捲入旋渦，至為痛惜。今日的反摩擦，仍是為了團結，打日本是主要的，武器的批評是次要的。深願我們能重走上團結抗戰之途。」<sup>123</sup> 中共嘴上道歉，行動上卻毫不猶豫，6月23日開始，黃河支隊陸續進占張老家、劉元集、趙廟等據點。黃體潤也向豐常官兵訓話：

- 1、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國家民族與地方，凡有騷擾國家民族與地方利益者，我們均須剷除之；
- 2、共匪禍國殃民，不打日軍，而專打我抗日部隊，漢奸是日奸，共匪是俄奸，無國家民族觀念，無禮義廉恥與忠孝節義之思想，是人類之公敵；
- 3、我們的口號是抗日除奸剿匪自衛。<sup>124</sup>

黃體潤此前講的「剿匪」是指土匪，現在的「匪」指的是共匪——共匪阻礙抗戰，不剿滅共匪，抗戰不能得到勝利，國家民族不能復興。<sup>125</sup> 對於國共關係的破裂，中共在日後進行了多次反思，認為湖西的統戰工作長期動搖在左、右之間，先右後左。所謂「右」，是指國共合作時強調統戰不要政權，無條件幫助馮子固、黃體潤，太平觀念沖昏了頭腦，沒有利用上層統戰關係開展下層工作；<sup>126</sup> 所謂「左」，是指錯誤的鋤奸肅反、反摩擦鬥爭，導致「我們只能獲得戰役上的勝利，而在戰略上和政治上是失敗的，造成了自己的孤立，頑固分子的向我聯合進攻，以及許多地區的工作垮臺。」<sup>127</sup> 中共此時的統一戰線策略囿於意識形態的束縛，將國民黨地方武裝統

<sup>122</sup> 《日記》，1939年11月22日。

<sup>123</sup> 〈郭影秋來信（1940年6月22日）〉。

<sup>124</sup> 《日記》，1940年6月26日。

<sup>125</sup> 《日記》，1940年6月18日。

<sup>126</sup> 〈湖西抗日戰爭史料（節錄）〉，《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上冊，頁423。

<sup>127</sup> 〈中共山東分局關於湖西今後工作的指示（1941年9月13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

稱為「頑固分子」，不分具體情況、不加區別地一致對待。在這背後，還帶有「一廂情願」的色彩。針對同「頑固派」的鬥爭，毛澤東曾提出三個原則，他認為需要將打擊、分化、籠絡等種種手段靈活地結合起來使用，以鬥爭求團結。仔細分析，這種策略「利己」的意味非常之濃，比如他說的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雙方實行休戰。這時，我們應該主動地又同頑固派講團結，和他們訂立和平協定。」<sup>128</sup> 畢竟國民黨才是當時的執政黨，進攻了所謂的「頑固派」之後又來講和，亡羊補牢的做法必然不會得到國方的原諒。這種僵化、利己又帶有僥倖心理的行為是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引起國民黨的反感、致使中共在湖西地區處境艱難的重要原因。

## 肆、三角鬥爭中的拉鋸（1940.7-1943.9）

國共關係破裂後，豐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國民黨豐縣政府和豐常控制有豐南六區、七區和豐北二區；中共占領了豐北三區和豐西四區、五區；豐縣縣城和一區（城關區）為日偽所占。吸取了之前忽視政權建設的缺陷，「六·一四」事變後，中共在軍事鬥爭外加強了政權建設。1940年6月23日，豐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後相繼建立了二區、三區幾個區政權和許多鄉政權。這一時期豐縣的整體局面可稱為三角鬥爭，國、共、日偽三方進入到錯綜複雜的糾纏中，國共關係呈現為一種拉鋸態勢。

### 一、黃體潤對中共的鬥爭策略

豐縣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使黃體潤堅信「其（指中共）阻礙抗戰，破壞中央行政系統，其掠奪政權之野心，至此暴露無餘矣」。<sup>129</sup> 豐常除防範日偽的襲擊和劫掠

二輯·文獻部分》中冊，頁63。

<sup>128</sup> 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17冊，頁201-202。

<sup>129</sup> 《日記》，1940年7月4日。



外，還要與中共對抗。為抑制並消滅本縣乃至湖西地區的中共力量，黃體潤首先寄希望於與鄰縣合作剿共。

中共的根據地位於豐、沛、單、魚幾縣的交界地帶，各縣的國民黨控制區分佈在四周，如果切實合作、包剿中共，能夠給予其較大打擊。1940年6月19日，黃體潤與湯鐵飛、馮子固商定合部西進計畫，與魯西地區的石友三、何柱國、朱世勤各部會師，打開蘇魯豫局面，實現「肅清豐碭單邊區匪徒，鞏固各縣政權」的目標。<sup>130</sup> 6月28日，專員湯鐵飛在單縣召集豐沛蕭碭四縣縣長及旅團長舉行會議，邀請山東省第十一區軍政首腦參加，會議決定江蘇第九區與山東十一區建立攻守同盟，組織抗日剿匪總指揮部，推舉朱世勤為總指揮，湯鐵飛為副總指揮，各縣縣長駐指揮部協助指揮。黃體潤對此評價說：「我蘇魯邊區抗日團體，經匪共之壓迫，得以精誠團結，共禦外侮，誠幸事也。」<sup>131</sup> 翌日，抗剿總指揮部召開會議，決定各部經常出兵數目：朱世勤一千五百人，沛常一千兩百人，豐常一千三百人，碭常一千人，蔣嘉賓五百人，合計五千五百人。<sup>132</sup> 此時中共的部隊主要是黃河支隊第一團和第二團，共三千八百人左右。<sup>133</sup> 僅從人數看，國方占有優勢。

1940年7月1日，蘇魯聯防總指揮部對合擊中共進行了部署，各部隊分編為八個梯隊，分三路向中共駐地推進、包圍。7月6日，豐常進攻趙廟，沛常進攻劉元集，兩軍將周邊的村莊占領，但中共戰鬥意志頑強，堅守不退卻，豐常犧牲較大，只得向週邊村莊撤退。<sup>134</sup> 此後幾日，雙方進入相持狀態。7日，專員指示黃體潤「如果匪明日仍不退，需要變更戰略，我軍不宜再用此圍困方式也。」<sup>135</sup> 此次大規模行動，國方並未獲得優勢。七、八月份，總指揮部又相繼組織了幾次對中共的圍攻，雙方互有勝負，均無法徹底擊潰對方，豐常能夠獲得一些小戰鬥的勝利，但總體呈拉鋸態勢，各縣聯合圍攻之事不久即作罷。除作戰能力不強、對中共的情況有誤判外，各支國民黨地方武裝為了保存自身實力，在作戰時存在支援不及時、不盡力等情況是合擊失敗的重要原因。黃體潤只能以「友軍相助，原系客情，不以我之利害

<sup>130</sup> 《日記》，1940年6月20日。

<sup>131</sup> 《日記》，1940年6月28日。

<sup>132</sup> 《日記》，1940年6月29日。

<sup>133</sup> 〈黃河支隊〉，《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三輯·專題部分》，頁196-197。

<sup>134</sup> 《日記》，1940年7月6、7日。

<sup>135</sup> 《日記》，1940年7月7日。

為切慮亦意中事」，<sup>136</sup>自我安慰。中共將「日偽頑之間及偽與偽、頑與頑之間，均有矛盾，不能一致行動」作為能夠在湖西地區擊退國軍圍剿、站穩腳跟的重要原因。<sup>137</sup> 各縣合剿中共，不僅在戰場上沒有占到便宜，還使中共益加相信國方蓄意挑起矛盾，毛澤東親自指示朱瑞：「你們應令魯西南部隊努力削弱馮子固等反共力量，並整訓擴大自己，建設比較穩固的根據地。」<sup>138</sup>

聯合作戰的失敗使黃體潤意識到豐縣不能太依賴外援，「豐人應負起治豐之責，不可完全依靠沛軍」。<sup>139</sup> 為收復失地、打擊共軍，他在戰場上和戰場外與中共展開了較量。所謂戰場上的較量指的是 戰鬥策略。國共合作時期，黃體潤對中共的種種優點和作戰能力有切身體會，中共「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政治作用、有作戰能力之悍敵」，與之對抗並非易事。<sup>140</sup> 在與中共的多次交手和勝敗往復之間，他逐漸摸索出不少應對中共的技巧。如他對官兵強調「對付匪軍，務要警戒嚴密，因匪軍好用黑夜襲擊之戰術，警戒稍為疏忽，即為所乘，便集之失，其前鑒也。」<sup>141</sup> 共軍作戰靈活，飄忽不定，往往出其不意，為防止其突擊和夜襲，保安旅的駐地一日一移，<sup>142</sup>白日防敵疏散兵力，夜間防匪集中兵力。

靈活移動外，黃體潤提倡「鞏固後方，開展前方」。「鞏固後方」是指建造據點、堡壘，與共軍「爭地面」，壓迫、封鎖中共占領區，又被稱為「擠」，進一寸是一寸，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縮小共軍的活動範圍。「開展前方」是指利用運動戰與游擊戰避開共軍主力，「今後剿匪，應切實注意時間空間，採取主動，尤應避強擊弱，避實擊虛，以少擊多之術，以疲敵力，分散敵力，削弱敵主力，壯我士氣，強我實力，覓尋良機，予以一鼓殲滅之」。<sup>143</sup> 黃體潤認為，將建造據點堡壘與機動作戰相結合，有助於將奸匪所占據之地及常到之地恢復過來，使抗日地區日漸擴大。先前保安旅

<sup>136</sup> 〈覆二團二大隊長薛廷燧信（1941年2月10日）〉。

<sup>137</sup> 〈冀魯豫軍區一九四三年軍事工作總結報告（1943年）〉，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第11卷，頁424。

<sup>138</sup> 〈毛澤東等關於山東華中的戰略部署給朱瑞等的電報（1941年4月5日）〉，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第8卷，頁167。

<sup>139</sup> 《日記》，1941年4月3日。

<sup>140</sup> 《日記》，1940年9月22日。

<sup>141</sup> 《日記》，1940年7月27日。

<sup>142</sup> 《日記》，1940年11月20日。豐縣常備隊改編為江蘇省第九區豐縣保安旅，縣長董玉珏任旅長，黃體潤任副旅長，所屬部隊編為三個團，自12月1日起正式啟用新番號。在下文中，本文用保安旅取代豐常。

<sup>143</sup> 《日記》，1940年9月20日。

多以團或大隊為單位活動，現在改以中隊或分隊為單位，單獨游擊，各自為戰，運用游擊戰術。為對付日偽軍機械化武器而破壞的道路、挖掘的壕溝均能用來對付共軍。為應對中共的突擊隊、偵察隊，保安旅特抽調人力和槍支，組織了十人一班的武裝便衣偵探，又稱游擊小組，「突出截擊，得勢則猛攻猛打，不得勢則疾行撤退。」<sup>144</sup> 為鼓勵士兵勇敢作戰，對俘獲共軍武器之士兵及所在部隊給予獎勵。

除在戰術上針鋒相對外，國共雙方的較量也蔓延到了其他方面，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是爭取民眾。在提出「爭地面」的口號後，黃體潤緊接著提出「爭人心」和「爭物力」，認識到發動民眾和爭取民眾支持的重要性，保安旅需要從民眾手中獲得糧餉和物資，得人心才能得物力。黃體潤重視爭取民眾支持亦緣於中共在占領區推行的政策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彈，如 1940 年 7 月 23 日，五區報告中共種種虐政，如「苛捐，用武力強迫老百姓捐麥捐錢，富者沒收家產」「強迫鄉長要地畝冊，每人只准有二畝地，其餘地畝所收糧食都須給他」等。<sup>145</sup> 二區區長報告稱民眾對中共頗為惶恐，「盼我軍趕速消滅匪軍，好減輕重大負擔。」<sup>146</sup> 另一方面，豐縣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國府的正統性和號召性依然很強，如郭影秋所說：「蘇北的國民黨一般有社會基礎，較強固的是豐縣。」<sup>147</sup> 得知民眾盼望保安旅保護的消息，黃體潤更覺倚靠民眾、獲得民眾支持的重要。

第二是動員和拉攏鄉鎮保甲長。根據縣政府的調查，中共在勢力較大的三區進行土地登記和人口調查，以供徵收食糧之用，縣府馬上派人對三區鄉鎮保甲長的政治立場進行了摸查，將其分為傾共、騎牆、傾我、傾偽幾種，根據態度選擇可爭取之人才。<sup>148</sup> 摸清基本情況後，黃體潤召集該區鄉鎮保甲長開會，要求鄉鎮長盡力檢舉隱匿各村的中共人員，早日肅清內奸。<sup>149</sup> 後又進行了更嚴格的規定，日偽匪無論多少，所到之處的鄉鎮保甲長須立時向區公所及附近駐軍報告，如有不報者，

<sup>144</sup> 〈覆第一團長王德舉信（1942 年 5 月 20 日）〉。

<sup>145</sup> 《日記》，1940 年 7 月 23 日。

<sup>146</sup> 〈二區區長高道詮報告（1941 年 1 月 29 日）〉。

<sup>147</sup> 〈湖西工作彙報（1943 年 10 月 11 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中冊，頁 692。

<sup>148</sup> 《日記》，1941 年 7 月 1 日。

<sup>149</sup> 《日記》，1941 年 10 月 6 日。

即以通敵論罪。<sup>150</sup> 縣府進一步提出健全鄉鎮保甲組織、清查戶口、訓練鄉鎮保甲長等措施，這是「用一方之良，除一方之莠」之策，從基層做起「森嚴抗戰壁壘」。<sup>151</sup>

第三是加強對軍隊和民眾「仇共」的宣傳、教育，內容以中共不抗日、壓迫民眾、強調階級鬥爭、破壞中國舊倫理道德為主。如 1940 年 7 月 18 日的訓話強調「共匪之禍國殃民及其破壞社會秩序、打破舊道德之種種罪惡，我們要保衛國家、民族與維護社會秩序及中國固有道德，必須堅決做抗日剿匪除奸工作，並擁護中央行政系統，實行三民主義。」<sup>152</sup> 在黃體潤的訓話中，中共的所有行為都被扣上「獸行」的帽子，共匪與日偽是一丘之貉，加入共產黨與做漢奸沒有本質差別。政訓處還收集整理了一些流傳於縣域內的諷刺、挖苦中共的歌謠數則，比如：

共產黨，真萬惡，互相爭權位，借名來肅托，蘇魯豫邊區上一次殺了三百多。抗日青年冤枉死，大家敢怒不敢說，若世上存有這惡魔，百姓難免招災禍。

共產黨，不抗戰，到處擴勢力，專門來搗亂，放區長，放縣長，奪取地方行政權，他們這樣做，倒說大家「妥協」「投降」「頑固」是漢奸，同胞們，仔細看，到底誰是私心滔滔，誰是為國向前。<sup>153</sup>

類似的歌謠還有若干，政訓處加以散發、傳唱，擴大在普通民眾中的影響。黃體潤還在教育中灌輸意識形態，縣府在控制地區恢復了中小學校，他常去講授抗戰課程，向中學生講：「共產黨如果將匪政權建立起來，首先受禍者亦為青年。共產黨以愚民政策，以殘酷手段，以專制思想來統制青年，必欲使青年陷於不忠不孝不節不義。」<sup>154</sup> 黃體潤的反共宣傳無疑是起到了效果的。湖西軍分區司令王秉璋在工作彙報中特別指出：「在湖西的頑中，豐縣最壞，宣傳教育很厲害，現在其占領區的上層對中共尚存懷疑：八路軍不講人情；怕肅反（頑固分子宣傳共產黨幾年要肅一次）；對我們的政策不瞭解。」<sup>155</sup>

<sup>150</sup> 《日記》，1941 年 11 月 11 日。

<sup>151</sup> 《日記》，1943 年 5 月 11 日。

<sup>152</sup> 《日記》，1940 年 7 月 18 日。

<sup>153</sup> 《日記》，1940 年 8 月 4 日。

<sup>154</sup> 《日記》，1941 年 10 月 13 日。

<sup>155</sup> 〈湖西工作彙報（1943 年 10 月 11 日）〉，頁 690-691。

第四是軟硬兼施，優待共軍俘虜和投誠之人，策反對中共不滿之人，嚴厲處決通共之人。對在作戰中俘虜的共軍士兵，黃體潤基本予以非常寬容之態度，「俘虜之士兵，凡有被脅迫者，一律給資（二元）遣散，重要份子送至我後方受訓，絕不輕易殺戮，以示我政府寬大為懷之至意。」<sup>156</sup> 黃體潤對主動從共軍反正而來者會給予獎勵。有時還會策反中共軍政幹部，如 1942 年 5 月 3 日，中共任命的五區區長劉尊傑主動與國方接洽，意欲投誠，經過數次接洽後，保安旅成功獲得劉部官兵四十余人及武器若干。<sup>157</sup> 這些俘虜和反正的中共份子為黃體潤獲取中共內部情報的重要來源，他還籌建了訓練委員會，開辦特種人員訓練班，專門訓練自首、投誠之共黨份子。<sup>158</sup> 不過，黃體潤對中共任命的或暗中為中共作事的鄉鎮保甲長以及共軍坐探態度極為嚴厲，一旦捕獲全部執行槍決，以示威懾。<sup>159</sup>

## 二、中共統戰政策的調整與國共接觸

湖西的三角鬥爭呈現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態勢，即日偽軍常在攻擊保安旅駐地後對中共根據地掃蕩，而保安旅又會在中共被掃蕩後趁機進攻，中共經常陷入兩面作戰的艱難處境中。由於在三角鬥爭中處於較不利的一方，中共除堅決反擊保安旅外，也嘗試調整統戰政策。

在三年多的明爭暗奪中，中共湖西地區的黨政軍領導，尤其是李貞乾多次致信黃體潤表明中共立場，試圖緩和雙方關係。1940 年 9 月 28 日，中共湖西專署專員李貞乾、豐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王效斌、三區區長渠伯奎、黃河支隊支隊長彭雄、政委張國華致信黃體潤，向其示好，黃推測中共突然求和的原因有三：

- 1、力量不足，不堪再戰，藉和為緩兵之計；
- 2、中共中央有新的指示，不使與各縣摩擦，原因是世界形勢對我好轉，英美法形成一個陣線，德意日形成一個陣線，英國和德國正在進行激烈的空軍戰等等。國際形勢之新變化與我國抗戰極有利，而共產黨亦不能違背國際形勢再開內爭，削減抗日力量；

<sup>156</sup> 〈致縣長董玉珪信（1940 年 8 月 17 日）〉。

<sup>157</sup> 《日記》，1942 年 5 月 3 日。

<sup>158</sup> 《日記》，1943 年 7 月 13 日。

<sup>159</sup> 如「匪四區區長馬樂三，經捕獲後就地槍決」。《日記》，1943 年 12 月 21 日，

3、自六一四事變後，邊區兵連禍結，民不聊生，共產黨實為戎首，廣為群眾所不滿，今藉言和，好和緩反對者之空氣也。<sup>160</sup>

上述三點都有依據，第一點應是最重要的，1940年9月12日，日偽軍向黃河支隊進犯，黃支損失慘重。<sup>161</sup> 黃體潤與李振乾友情深厚，由李帶頭致信或有回轉可能。黃體潤給五個人都回了信，從內容看，他最不解的是中共為何要攻擊豐常，並將不抗日的漢奸罪名扣在自己身上。在給李貞乾的信中他質疑：

豐縣縣政府不是不合法的縣政府，為什麼要推翻另組織一個政府呢？豐縣常備隊不是不抗日，為什麼反說他是漢奸部隊呢……你們編造種種事實來罵我們，孫莊事變，你們想整個解決我們，偏說我們先打你們。我們現在舉動是抗八抗共，可不是反八反共……豐常是為自衛而戰，不是為侵略而戰，這是出於無可奈何，誰願意自相殘殺，為親者痛、仇者快呢……這不是減少抗日力量麼？但這個罪過歸誰，豐常不能負責，誰為戎首，誰去負責。<sup>162</sup>

在給王效斌的信中也同樣質問：

團結是生路，分裂是死路，在國難嚴重局面之下，誰也相信這句話是對的，中央軍到處扶植抗日政權，而抗戰成績益彰，八路軍初到豐縣，大家不是精誠團結、共同抗日麼？為什麼後來八路軍非奪取政權，非打倒豐常不能抗日呢？這是我深思不能解者。」在給彭、張的回信中，黃重申：「團結抗戰，是所至願，但破壞團結者，非豐常，實貴黨貴軍耳。<sup>163</sup>

黃體潤堅信破壞抗戰團結的責任全部在中共。

1940年十月上旬，李貞乾再次來信講和，黃體潤只是說「措辭較前卑鄙，想見其怯弱之狀矣。」<sup>164</sup> 十月下旬，來自李的求和信「雪片飛來」，或是顧及到昔日之情，黃體潤也稍有動搖，「真歟？假歟？緩兵之計歟？令人不可捉摸。置之不理歟？

<sup>160</sup> 《日記》，1940年9月28日。

<sup>161</sup> 《日記》，1940年9月12、13日。

<sup>162</sup> 《日記》，1940年9月28日。

<sup>163</sup> 《日記》，1943年9月28日。

<sup>164</sup> 《日記》，1940年10月12日。

答覆歟？久久不能決。」<sup>165</sup> 1941年五月中旬，中共方面又派呂英前來談和，黃認為「匪真小人也，近之則價高，遠之則有卑」，對其方法，只有「打擊他」才能和，「求」決不能和。<sup>166</sup> 1942年3月30日，李貞乾再次來信，擬修舊好，李在信中並未談及多少軍政方面事情，而是以兩人之間的感情作為主要基調。但黃體潤沒有相信，「奸黨詭計多端，未知有無陰謀也。」<sup>167</sup> 一個月後，中共又托豐縣當地名紳，也是黃體潤的舊交王又參提出和平條件，具體如下：

- 1、雙方各守原防，兩不侵犯。
- 2、清理邊境，均不得到達邊防以外徵夫役、取食糧、勒捐富戶。
- 3、雙方立即停止軍事上的敵對行為。
- 4、互通情報。
- 5、共同配合打擊敵人。
- 6、注意保障人民抗日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和生命財產的安全。
- 7、雙方對激烈份子各加以訓誡及防範，以免發生不幸事件。
- 8、各將扣留對方工作人員迅行釋放，以利工作。
- 9、流通券之發行，均應有一定界限。
- 10、必要時雙方各派代表促進和平。<sup>168</sup>

上述條件緩兵之計的意味頗明顯，實質是讓黃體潤承認中共在豐縣各占領區的合法地位。黃體潤「以奸黨素來不講信義，對於和平條件，絕不敢置信也」。<sup>169</sup> 中共向保安旅表示緩和，是為了緩解作戰壓力，不過其中亦有情感因素，求和信絕大多數由李貞乾所寫，只有李所寫的信會讓黃體潤動搖。1942年12月23日，李貞乾在日偽對中共的大掃蕩中陣亡，黃體潤得知後，在日記中寫道：

---

<sup>165</sup> 《日記》，1940年10月28日。

<sup>166</sup> 《日記》，1941年5月22日。

<sup>167</sup> 《日記》，1942年4月6日。

<sup>168</sup> 《日記》，1942年5月21日。

<sup>169</sup> 《日記》，1942年5月21日。

李貞乾確已殉難，十數年至交好友，後彼雖誤入奸黨，與本軍為仇，然一憶及李之忠厚和藹，與其節儉廉潔，吃苦耐勞之精神，確為不可多得之人才。今竟以抗敵死，實不勝其悲愴也。<sup>170</sup>

中共之所以頻繁與黃體潤接觸，試圖改善雙方的關係，是因其在三角鬥爭中處於弱勢地位，不僅是在湖西，在抗戰的整體局勢中也是如此。湖西地區受肅托的影響，中共的力量很長時間無法恢復到肅托前的情況，地方武裝發展緩慢，品質太差，成分複雜，組織不嚴。<sup>171</sup> 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合在一起也處於下風，湖西地委在工作彙報中指出：「1942年七月間的敵、我、友力量比較：敵人三千人，偽軍七千人，友軍二萬五千人，我主力與地方部隊共約五千人。」<sup>172</sup> 這裡的友軍應是指全部國民黨武裝。直至1943年十月，湖西地委書記潘復生在總結三年來的工作時仍強調：「湖西今天基本是三角鬥爭，而我們仍是劣勢，操主動的是敵人，我們沒成為抗戰的核心。」<sup>173</sup> 實力處於下風，促使統戰政策發生轉變。1941年9月13日，中共山東分局對湖西的工作進行了指示：「湖西統戰工作要從頭聯絡起，任何人都可以聯絡（打了的、沒有打的），但中心要抓住董漢槎，通過董而進到各縣長、各保安旅、以至到馮子固與朱世勤開門。不僅從上層作，而且要從下層作，要召開會議討論決定具體策略。」<sup>174</sup> 這意味著要著力改善與國民黨地方武裝的關係。1942年5月20日，羅榮桓、陳光指示冀魯豫分區：「我應利用時機，擴大日偽間矛盾，展開統戰工作，動搖豐、沛、碭之地方頑固勢力，推廣自己活動地區，反對敵之蠶食政策。」<sup>175</sup> 中共的統戰政策是靈活性與實用性的結合，只要有利於自己，即便是既抗日又反共的堅決頑固，也要爭取其好轉，「擴大其與日偽的矛盾，加強聯絡，發揚其抗日的一方面，用適當方法方式批評其反共的一面。」<sup>176</sup>

<sup>170</sup> 《日記》，1942年12月23日。

<sup>171</sup> 〈湖西地委一九四一年一、二、三月份戰爭動員工作報告（1941年4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上冊，頁590-591。

<sup>172</sup> 霍國棟，〈關於湖西工作的彙報（1943年6月6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中冊，頁631。

<sup>173</sup> 〈湖西工作彙報（1943年10月11日）〉，頁706。

<sup>174</sup> 〈中共山東分局關於湖西今後工作的指示（1941年9月13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中冊，頁65。

<sup>175</sup> 〈羅榮桓、陳光、陳士榘致楊得志、蘇振華、張霖之並報中央軍委、集總、新四軍軍部電（1942年5月20日）〉，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233。

<sup>176</sup> 〈冀魯豫邊區的形勢與任務——黃敬同志在區黨委高幹會上的報告（1942年12月）〉，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9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頁533。



山東及冀魯豫對統戰政策的調整又是遵從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儘管這一時期國共關係波詭雲譎，國民黨不斷挑起摩擦事件，甚至製造了皖南事變，但中共認為主要矛盾仍然在中日之間，為盡可能團結可以依靠和利用的力量，中共中央逐步糾正各地在反摩擦中發生的「左的錯誤」。1940年7月7日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之決定》明確提出：「必須廣泛的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要研究對待各友黨各友軍及各階級階層的策略問題。」<sup>177</sup> 中共的統戰政策已走出了僵化、教條的窠臼，變為極具目的性與功利性的實用手段。以中共中央發佈的《對友軍擴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為例，裡面詳細列出了各種「交朋友」的方法，既有原則、態度，也有策略和方法，利用人情和關係是重要內容，如「充分利用與友軍有社會關係的黨員指導他們去和友軍做朋友工作」、「經過友軍首長的至親密友去影響他」。<sup>178</sup> 在湖西地委對頑的劃分中，黃體潤是標準頑固分子——堅決抗日，堅決反共，對於這樣最棘手的頑固頭目，李貞乾多次致信示好，在信中談及往事和舊情，究竟是他的本意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利益不得而知，但這種方式確實是中共統戰政策中的一環。

### 三、國共形勢的轉折

原本，國民政府劃定了魯蘇戰區，1939年一月成立，由東北軍將領于學忠任總司令，在魯南和蘇北進行游擊作戰，但效果不甚理想，尤其對中共在山東的發展無能為力。蔣介石為在山東敵後遏制中共的勢力，於1939年秋召見李仙洲，決定由李率部入魯，支援于學忠部。<sup>179</sup> 李仙洲率領九十二軍自1939年年底從湖北北上，因棗宜會戰和皖南事變滯留在皖北。<sup>180</sup> 李部入魯的消息黃體潤期盼了許久，在與中共的長期對峙中，黃認識到對匪作戰必須配合國軍，借助國軍之力。<sup>181</sup> 1942年8月27日，馮子固轉來李仙洲的會剿奸匪密電，對魯西、湖西各部隊進行了作戰部

<sup>177</sup> 〈中央關於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194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頁454-456。

<sup>178</sup> 〈中央關於對友軍擴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194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頁464。

<sup>179</sup> 李仙洲口述，靳星五等整理，〈我的回憶〉，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內部資料，1979），頁132。

<sup>180</sup> 李仙洲入魯的詳情可參見〈李仙洲九十二軍入魯始末〉，孫占元、楊明清主編，《山東重要歷史事件·抗日戰爭時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247-256。

<sup>181</sup> 《日記》，1943年8月12日。

署。<sup>182</sup> 1943 年二月，蔣介石任命李仙洲為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準備入魯作戰。<sup>183</sup> 為將當地的反共力量統一起來，李仙洲對湖西各縣地方武裝進行了改編，豐縣保安旅的一二兩團不變，三四兩團改編為豫魯蘇皖邊區挺進軍第二路第九縱隊，配合國軍作戰。<sup>184</sup>

蔣介石的企圖早已為中共洞悉。羅榮桓認為必須破壞李仙洲的北上計畫：「李仙洲入魯，使山東敵頑我三者的鬥爭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為自衛計，阻止李部入魯反共，不得不成為當時軍事鬥爭的重點。」<sup>185</sup> 1943 年五月初，李部先頭部隊抵達豐縣、碭山和單縣一帶，黃體潤派大隊長薛廷燧前往與李部接洽，薛回信稱：「近與國軍商西進剿匪問題，已蒙准於即日前進，明晨我二大隊及政工隊均隨之西進，協同整理三區保甲及清查匪皮等工作，回思匪類流毒邊區，為時已久，今借國軍主力西進痛剿，此當前之良機，不可失也。擬請鈞長令飭一二兩團相機北進，收復四區。」<sup>186</sup> 黃體潤隨後調動第一、二兩團北上，準備趁機收復被中共占據的豐北，黃致信王德舉和彭世亨兩位團長，請他們竭力配合國軍：「此次國軍圍剿豐單邊境之匪，具有最大決心與縝密計畫，似不至中途變更。」<sup>187</sup> 黃體潤對此次作戰給予了十分高的期待，7 月 22 日，他特意晉謁李仙洲，與李詳談剿匪事宜：「非清剿豐金魚單邊區之奸匪，不能打通徐西與魯十一區（單城鉅曹等縣）之聯絡，不能鞏固國軍入魯之門戶。」<sup>188</sup> 他認為，「如此軍失敗，邊區局面，必大為改觀……國軍之成功，即地方之成功也。」<sup>189</sup> 可見他期待此役獲勝之迫切。

面對李部和各縣地方武裝的進攻，中共決定給予反擊，自戰役開始李部就一再受挫，至 1943 年八月底戰役結束時，李仙洲部受到重大損失，「傷亡一萬二千人，戰鬥力已漸減弱。」<sup>190</sup> 對李戰役的勝利標誌著湖西、冀魯豫乃至整個山東地區形

<sup>182</sup> 《日記》，1942 年 8 月 27 日。

<sup>183</sup> 〈蔣中正電湯恩伯（1943 年 2 月 13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國史館藏，002-090106-000 16-329。

<sup>184</sup> 《日記》，1943 年 4 月 29 日。

<sup>185</sup> 羅榮桓，〈打擊李仙洲北上反共部隊的部署（1943 年 7 月 26 日）〉，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 10 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頁 464-465。

<sup>186</sup> 〈薛廷燧來信（1943 年 5 月 31 日）〉。

<sup>187</sup> 〈致一團長王德舉、二團長彭世亨信（1943 年 6 月 26 日）〉。

<sup>188</sup> 《日記》，1943 年 7 月 22 日。

<sup>189</sup> 《日記》，1943 年 7 月 27 日。

<sup>190</sup> 〈李仙洲電蔣中正（1943 年 7 月 19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國史館藏，002-090200-000 82-281。

勢的轉變，中共更加穩固了在山東地區的優勢，國民黨的勢力受到了嚴重挫敗。黃體潤對此次剿共失敗極為痛惜：「奸匪將愈逼愈緊，恐獨木難支，大廈前途將傾，頗堪憂慮也。」<sup>191</sup>

中共擊退李仙洲部後不久，9月21日，日偽軍集結三萬餘人對冀魯豫邊區進行秋季大掃蕩，規模之大遠超既往。此次掃蕩以中共的勝利告終。此時的日偽軍已是強弩之末，再也無力發動大規模的掃蕩。擊退李仙洲部和日偽軍，證明了中共在湖西地區的發展得到了強有力的鞏固，三角鬥爭的形勢在此發生了轉折，中共逐漸確立起對國民黨地方武裝的優勢。正如中統局向何應欽呈送的報告中所寫的：「以我為被動，中共取主動；我活動地由面而點，中共則由點而線而面。如魯南、魯東兩大地區，整個赤化，且能聯絡無阻，遂恃為進攻退守之基礎。故我活動日蹙，中共勢力日盛……我軍形勢，已到剿匪重於抗戰局面。」<sup>192</sup>

---

<sup>191</sup> 《日記》，1943年8月30日。

<sup>192</sup> 〈山東中共與敵我勢力之消長情況（1944年10月27日）〉，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參考資料》，第3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頁71。

## 伍、國共實力逆轉（1943.10-1945.9）

李仙洲部南撤後，湖西各縣失去了外援，「奸匪勢甚猖獗，徐西遂感孤立。」<sup>193</sup> 黃體潤雖然意識到中共的威脅已超過日偽，但他並不清楚中共在根據地進行的群眾運動、大生產運動等一系列舉措使中共今時不同往日了。在對共策略上，黃體潤仍然固守依靠據點的戰術，比以前更執著，將此作為根本手段。他再次嚴詞拒絕了中共的談和意願，認為「匪與誰講統戰，就是算計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匪之政策，是消滅國民黨，奪取政權，提倡階級鬥爭，其手段是打一拉一，又拉又打，軍事不行換政治，政治不行換軍事，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sup>194</sup> 無論如何，中共絕不會真心求和，因此正確的做法是做好襲擊與作戰的準備。

1944年元旦剛過，黃體潤向部隊佈置新一年的軍政要務，他明確指出：「國際形勢好轉，最後勝利今年就有希望，可是共匪破壞抗戰，對本縣大肆搗亂，我們如果不努力剿匪，大有被共匪吞食之可能。」<sup>195</sup> 國軍無法指望，單憑本縣勢單力孤，為剿滅湖西的中共勢力，黃體潤、馮子固等人再次將希望寄託在各縣聯合上。1944年2月8日，馮子固召集豐、沛、碭、魚四縣官長六十餘人舉行軍事會議，以求進一步團結，會議議決了四縣嚴密情報、劃一待遇、清剿奸匪、開辦技術人員訓練班、指揮部按期檢閱或訓示部隊等決議。<sup>196</sup> 在國方準備重整旗鼓時，中共也在根據地大力開展各項運動，實力不足、立場軟弱的縣如碭山，在中共的勢頭下主動放棄了重要據點。

面對愈加危急的局勢，黃體潤嘗試聯絡國民黨蘇魯地區的軍政統帥。1944年三月初，黃體潤前往安徽阜陽，此時江蘇省政府駐太和縣，從蘇魯地區撤出的一部分國軍駐紮在渦陽、臨泉等皖北地區。黃體潤接連晉謁江蘇省主席韓德勤、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陳大慶、山東省主席牟中珩等軍政要員，請求增援魯西、徐西一帶。4月1日，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抵達安徽臨泉，召集徐西軍政領袖開會，黃體潤

<sup>193</sup> 〈致馮允齋信（1944年3月20日）〉。

<sup>194</sup> 〈致二團長彭世亨信（1943年12月15日）〉。

<sup>195</sup> 《日記》，1944年1月7日。

<sup>196</sup> 《日記》，1944年2月9日。

寫了一份報告向湯彙報徐西危急情形，請其增援徐西，補給各縣子彈。<sup>197</sup> 國民黨當局也有再次向湖西地區開展軍事行動的意圖。1944年五月，國民政府將原蘇魯戰區游擊總部改組為山東挺進軍和蘇北挺進軍兩個總指揮部，以馮子固為蘇北挺進軍第一軍分區司令，下轄五個縱隊和豐、碭兩縣的保安旅，共約一萬五千人，黃體潤的第九縱隊被改編為第三十四縱隊。<sup>198</sup> 此次軍事部署將蘇魯地區的地方武裝全部整編了起來，除馮部外，還有山東的申憲五、時錫九和徐州的耿繼勳、劉子仁、董漢槎各部，這些武裝在蘇魯交界、湖西各縣活動，對中共根據地呈包圍狀，力圖阻斷魯南與湖西的聯繫。

就在國方整編部隊，頻繁動作時，中共山東根據地正準備繼續擴大優勢，殲滅最壞部隊、殘餘頑軍，改善山東根據地的堅持條件。中共所謂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一個兼具原則性與實用性的口號，一旦國民黨做出了「犯」的行為，中共必予以嚴正反擊。1944年6月18日，馮子固配合周侗、耿繼勳向滕縣、銅山等地的中共據點進攻，占領了夏莊，切斷了湖西和魯南的交通。<sup>199</sup> 得悉國民黨地方武裝聯合進犯的消息後，羅榮桓、黎玉決定乘青紗帳時期組織反擊。<sup>200</sup> 7月8日，為策應新四軍第四師向皖北發展，中央軍委電令山東軍區組織「微山湖討頑戰役」，向盤踞湖西的各縣國民黨軍隊展開進攻，直至徹底肅清。<sup>201</sup> 冀魯豫軍區隨即對各部隊進行部署，與魯南部隊相配合協同作戰。23日，中共的動向為國方得知，豐縣政府秘書蔣耀之致信黃體潤，表示共軍準備向豐縣據點進攻。黃深知此次戰役至關重要，「勝則可安一時，敗則前途危殆。」<sup>202</sup> 但在他看來，無論中共如何準備，只要堅守據點，待到周邊縣份的援軍趕到，必能戰勝共軍，他對據點極有信心。

1944年7月30日，中共湖西和魯南部隊先後發起攻擊，殲滅了國民黨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七三個縱隊和地方武裝韓治隆部，魯西地區的局勢為之大變。八月初，中共趁勝追擊，圍攻駐紮在沛縣北部周寨、魏樓的第三十六縱隊，8月7日，國共

<sup>197</sup> 《日記》，1944年4月2日。

<sup>198</sup> 《日記》，1944年5月9日。原第九縱隊下轄二五、二六、二七三支支隊，現分別改編為一百、一零一、一零二支隊。

<sup>199</sup> 《日記》，1944年6月21日。

<sup>200</sup> 〈羅榮桓、黎玉、蕭華致中央軍委、集總電（1944年7月7日）〉，《羅榮桓年譜》，頁377。

<sup>201</sup> 王秉璋，〈微山湖討頑戰役會議片段〉，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編，《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第八期》（內部未定稿，1985），頁111。

<sup>202</sup> 《日記》，1944年7月24日。

雙方在魏樓展開激烈戰鬥，豐縣派出一百和一零一兩個支隊前往支援，結果魏樓守軍被全部殲滅。中共採用「圍城打援」戰術，由騎兵團對援軍進行伏擊，豐縣兩個支隊在撤退時於大蔡家被中共騎兵突襲，損失慘重。

魏樓據點被攻破後，豐、銅兩縣軍政首腦在豐城南的新范莊會面，判斷共軍必將南下，進攻新范莊和單樓。駐守豐西的彭世亨建議黃體潤：「局勢至此，一木難支大廈，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材燒，不必死守據點。」<sup>203</sup> 黃體潤則下定決心死守新范莊。8月16日下午三時，共軍集中火力向新范莊據點猛攻，雙方激戰四個小時，「此次奸匪猛撲，炮火之猛烈與來勢之兇猛，為抗剿以來所未有也。」<sup>204</sup> 18日，新范莊據點被共軍攻破，守軍全軍覆沒。此次出險後，黃體潤一蹶不振，「余自出險後，精神疲敝異常。念及李支隊長星浦之壯烈殉國，及我官兵傷亡之慘重，心緒尤為惡劣，加以匪氛日熾，善後乏術，深感不如與星浦同死寨內之為愈也。」<sup>205</sup> 8月20日，黃體潤與縣長商定，目前共軍已經向西北行進，必定圍攻豐西據點，孤立無援，久守必敗，於是令一二兩團放棄據點南來。<sup>206</sup> 至此，豐縣剩餘的武裝力量全部駐守在豐縣南部一、六、七三個區，北、東、西三面已全數失去，一百、一零一和一零二三個支隊幾乎全軍覆沒。環顧局勢，黃體潤志氣頹喪，「以奸匪之勢已成燎原，而我軍士氣頹喪，如匪再進犯，即此六、七兩區亦難保全。六年心血將付之東流，愁苦真不堪言狀矣。」<sup>207</sup>

1944年9月2日，黃體潤召開黨政軍談話會，決定緊縮組織、裁減冗員，對一二兩團及殘餘部隊進行了整編。<sup>208</sup> 這次慘痛的失敗使黃頭腦清醒了不少，真切認識到了保安旅與中共的差距：「軍令不如奸匪之嚴、官兵體力不如奸匪之強、戰略戰術不如奸匪之巧妙、調動不如奸匪之靈活、奸匪有外援。」他認為，這些缺點如不能補救，將來必遭失敗無疑也。<sup>209</sup> 18日，黃體潤召開了軍事會議，宣佈了半個多月來反思的要點和改進的舉措，頒佈了部隊縮編辦法，對本部的機構設置進行了

<sup>203</sup> 〈二團長彭世亨來信（1944年8月13日）〉。

<sup>204</sup> 《日記》，1944年8月16日。

<sup>205</sup> 《日記》，1944年8月19日。

<sup>206</sup> 《日記》，1944年8月20日。

<sup>207</sup> 《日記》，1944年8月23日。

<sup>208</sup> 《日記》，1944年9月1日。

<sup>209</sup> 《日記》，1944年9月16日。

精簡。這些舉措有助於裁汰冗員，保留精華，提升作戰能力。但中共沒有給黃體潤東山再起的機會，九月初，為進一步打開湖西局面，徹底消滅國方力量，中共又增調部隊向銅、豐、沛、蕭幾縣發起第二階段攻勢，各縣據點接連陷落。眼見敗局已定，黃體潤對董玉珏云：「現徐西各縣主力均被匪擊破，士氣已喪，匪既攻陷單樓，對我必更加緊進犯，決不放鬆。匪對徐西，志在必得，計畫已非一日，且匪共中央、省、縣、地方已打成一片，力量雄厚，華北數省淪陷區域，均被其盤踞，徐西孤立一隅，又無國軍來援，吾等決難立足。遇必要時，我等惟有逃往後方，因戰既不能勝，退又無處退，在此白白犧牲，已無代價。」<sup>210</sup> 徐西各縣的地方武裝基本都被擊潰，沒有和中共還手的餘地了。

1944年9月18日，縣長董玉珏乘車赴安徽太和向省主席韓德勤報告徐西各縣艱危情形。黃體潤也決心逃亡後方，10月2日，他將豐縣軍政事務委托給薛廷燧負責，向留下的幹部表示：「以局勢如此，如再不逃去，不被奸匪俘殺，就被鬼子脅持，縱抱犧牲決心，亦無挽回希望。惟有留此一身，俟大局好轉，再行回縣收拾殘局。」<sup>211</sup> 之後便於黃口車站乘火車西去，在安徽界首西的紙店鎮安定下來。除黃體潤外，豐縣黨政軍公務人員紛紛外逃。至此，豐縣國共之間的形勢已完全逆轉，以中共獲得壓倒性勝利、國方慘敗告終。<sup>212</sup> 中共在評價湖西戰役時指出：「從根本上改變了湖西地區八路軍與日偽頑鬥爭的局面，冀魯豫邊區與皖北、魯南區連成一片，使湖西區這一由華中通往華北的門戶和交通樞紐完全為我掌握。」<sup>213</sup> 不僅是湖西，全國範圍來看也是如此，中共中央就此評價：「最近八個月，中國政治形勢起了一個大變化。國共力量對比，已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並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sup>214</sup>

<sup>210</sup> 《日記》，1944年9月24日。

<sup>211</sup> 《日記》，1944年10月2日。

<sup>212</sup> 有關抗戰期間與中共的恩怨，豐縣黨政軍界人士來到臺灣後多有回憶，收錄在《豐縣文獻》中。如張電光，〈參加八年抗戰剿匪之經過〉，《豐縣文獻》，第三期（1979），臺灣大陸同鄉會文獻數據庫（<https://www.tongxianghuicn.com/article/818310.jhtml?libId=>），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5月20日。

<sup>213</sup> 繆欣然、李子祥，〈湖西東進反頑戰役〉，《豐縣革命史料選·第八期》，頁177。

<sup>214</sup> 〈中央關於目前形勢的分析與任務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432。

## 陸、結語

本文擬針對豐縣故事提出如下幾點思考。

第一是影響豐縣國共關係的因素。既有研究已對抗戰時期國共高層關係的起伏進行了充分探討，影響因素涉及諸多方面，比如國際關係、抗戰形勢、軍事實力、財政經濟等。通過對豐縣進行微觀考察，可發現有兩個重要因素影響著國共雙方的此消彼長。其一是裂縫。學者指出：民國時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都處於崩裂的狀態中，震盪的餘波深入社會肌理，形成了若干相對獨立的板塊和諸多結構性裂縫。<sup>215</sup> 這種「裂縫」有兩個表現：一是地緣，二是統治結構。從地緣上看，豐縣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屬於江蘇省，但並不在核心區，蘇魯豫皖四省交界，是由國民黨掌控的核心板塊向由地方實力派控制的漂移板塊過渡的結合地帶。當國民黨中央政權的統治保持穩定時，這裡尚能維持秩序，一旦淪陷，就陷入了一種「幾不管」的狀態中，僅留下各縣的地方武裝苦苦支撐。周邊的國民黨軍政勢力對這裡或鞭長莫及，或有心無力。從統治結構上看，國民黨政權在名義上將民初以來崩裂的板塊拼接到了一起，實質上沒有彌合因崩解帶來的深層斷裂。國民黨的黨權在基層社會影響微弱，黨權停留在縣黨部，黨治空虛乏力，在鄉村社會更是見不到黨組織的身影。<sup>216</sup> 這意味著形式上建立起來的「區—鄉（鎮）—保—甲」體系缺乏強有力的信仰約束和權威認同。綜觀黃體潤多年的從政經歷，他對各區區長尚能有力支配，對鄉鎮保甲及村莊明顯力不從心，無論是在豐縣政府還是在武裝中，國民黨的存在感都十分薄弱。中共是一支極具進取心、組織力和行動力的力量，國民黨的缺位、統治的裂縫、戰爭導致的失序為其建立根據地並進行發展提供了天賜良機。

第二是人情，這是貫穿豐縣國共關係演變的一條重要線索。抗戰開始時，國共雙方有了合作的基礎，維持著比較好的關係，分歧被暫時遮蔽。中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積累了一套靈活、實用的生存策略，基層社會近似真空的狀態有利於中共運用人事安排、駕馭人情政治，親情、友情、各種社會關係都能被其用來發展組織、

<sup>215</sup> 黃道炫，〈密縣故事：民國時代的地方、人情與政治〉，《近代史研究》，第4期（2017），頁5。

<sup>216</sup> 王奇生，〈戰前中國的區鄉行政：以江蘇省為中心〉，《民國檔案》，第1期（2006），頁68。



擴充實力。黃體潤也是如此，他對中共的包容與贊佩，很大程度上緣於他對李貞乾的信任和倚賴，這是人情政治的生動體現。當雙方關係破裂時，中共為避免同時與日偽和國方作戰，不斷動用人情來向黃體潤做統戰工作，對中共已經徹底失去信任的黃體潤，只有在讀到李貞乾的來信時才會有所猶豫。利用人情，背後不免有功利性色彩，但「情」的出現往往凸顯出歷史的真實性和複雜性，身處其中的人對「情」作出的反應也頗值得後來人揣摩和體味。

第三，作為一個有著堅定理想和信念的國民黨員，黃體潤在艱難困苦淪陷區憑藉自身的堅韌與執著，建立了一支武裝力量，自備武器、自尋補給、自我訓練、游擊抗戰，得不到上級軍政部門的有力支持，卻一直堅持到抗戰結束。雖然在抗戰後期黃體潤與偽軍聯合對抗中共，但他從未對抗戰產生過動搖與妥協，他為抗日戰爭作出的貢獻需要銘記和肯定。再者，在中共的官方敘述體系中，國共之間發生摩擦、關係經受波折，往往都歸咎於國民黨，將自己塑造為受害者，國民黨處於失聲的狀態，愈是到下層愈缺乏真實的材料。黃體潤的案例揭示出國民黨在面對咄咄逼人、不擇手段的中共時，確實有著苦衷與不易之處，明明是以抗日大局為重，卻頻頻受到惡意抹殺，他的遭遇為研究者反思中共的行為模式和組織方式提供了借鑒。


第四，中共的統一戰線是其在國共合作的大架構中擴大活動空間的手段。<sup>217</sup> 就其特色而言，是原則性、靈活性、策略性與實用性的統一。但我們必須要看到其背後顯露出的侵略性和狡詐性。抗戰期間，中共名義上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但從未放棄自身的獨立地位和奪取政權的目標，其各種策略和行為無不是為了維護自身生存與發展。身處執政地位的國民黨難以理解和接受中共的一些行為，比如中共在進攻後即來求和，堅決反共的國方人士自然不會接受，而原本並不一定要反共的，則會因中共的攻擊而走上堅決反共的道路。黃體潤就是一個實例，中共在「六·一四」事變中出現的戰略失誤是將黃推向反共軌道的最大助力，使他堅信「親匪者，如幡然悔悟，或有可為，否則，終必為匪吞噬也。」<sup>218</sup> 而在中共看來，黃不願重歸於好正說明了他的頑固，只有通過繼續打擊與鬥爭才行。中共的狡詐性還體現在試圖通過製造日偽與國民黨的矛盾來保存自身的利益，冀魯豫邊區黨委書記黃敬就此說

<sup>217</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333。

<sup>218</sup> 《日記》，1944年7月28日。

道：「我們應使敵頑矛盾擴大，這是為了民族利益。」<sup>219</sup> 這固然是為了民族利益，但真實意圖顯然沒有那麼單純，實質是為了維護中共自己的利益。中共超常的組織力與執行力背後，是一種近乎極端的利己主義。

國民黨對待中共提出的「統一戰線」口號的態度也值得關注。在國民黨看來，其與中共在抗戰上並不是平等合作，也沒有共同建設統一戰線的意願，中共僅是接受其金錢與物質補助、聽從其指揮抗日的附屬勢力，國民黨政權的正統性、對抗日的領導地位是不容動搖的。雙方有著根本性的矛盾，即便上層可以在表面上維持合作，下層也會進行競爭。<sup>220</sup> 國民黨的這種態度生動地體現在黃體潤身上，例如在對待人情上，黃體潤與鄰縣的國民黨軍政領袖保持著密切聯繫，互相支援，幾次結成聯盟共同應對中共的威脅，即便偶有齟齬、配合不當，也沒有影響他們的關係。而在對待中共方面，黃體潤僅保持著與李貞乾的聯繫，對中共其他黨政軍幹部沒有什麼興趣，態度冷淡，也缺乏主動接觸以改善關係的動力。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在黃體潤看來，國民黨是無可爭議的正統，中共只有服從和支持，要在國民黨的領導下進行抗戰，任何反對、破壞等行為都是不可原諒的，是提倡階級鬥爭、破壞舊有道德、掠奪政權的陰謀。<sup>221</sup> 國共缺乏互信，各種大小摩擦和衝突不斷消弭雙方信任的基礎，當國共之間的隔閡增加到一定程度時，人情便不再能發揮太多的作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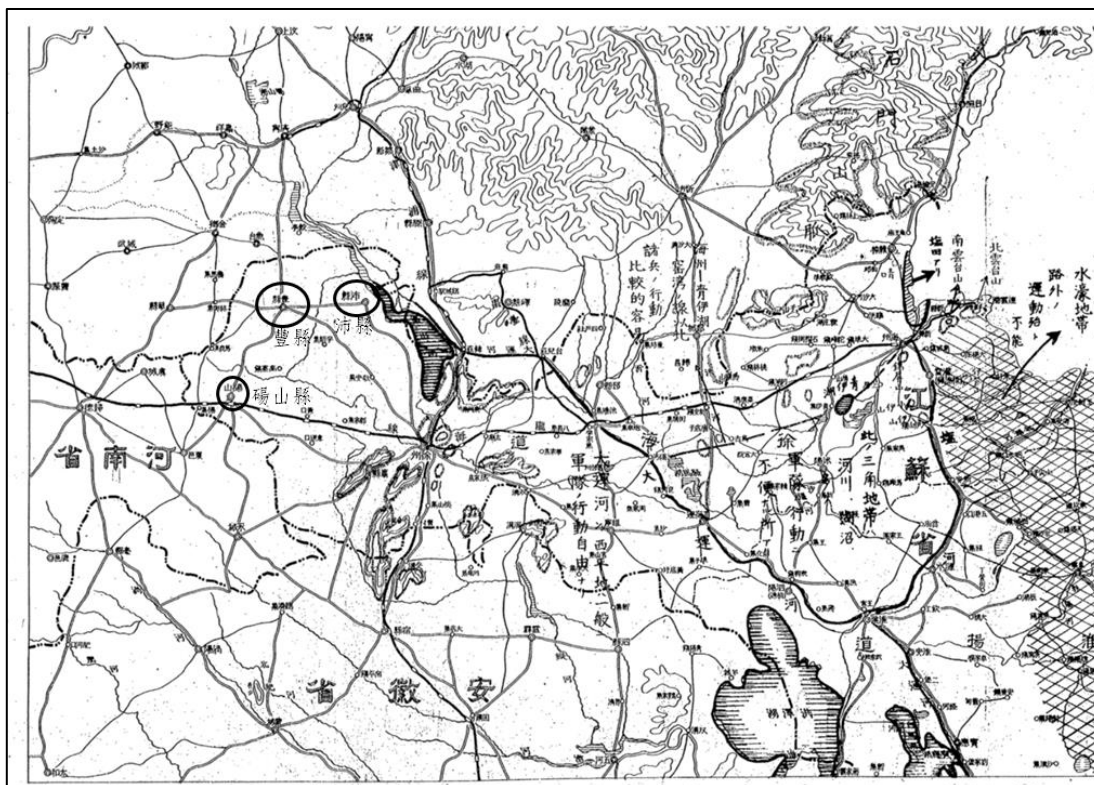
最後，是「小歷史」與「大歷史」的結合。豐縣故事無疑是只是抗戰時期歷史洪流中的一個小波紋，這一小波紋既裹挾在大潮的湧動中，無法擺脫，又折射出自身的紋路與特色。國共高層的分歧與合作、鬥爭與妥協不可避免地對豐縣產生了影響，豐縣所處的地理位置、與周邊地區的關係、黨政領導人的想法與抉擇等無不體現著這一小邑自身的發展邏輯，尤其是黃體潤的人生經歷，已然與豐縣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了一起，為宏大的抗戰史增添了一個生動的註腳。發生在豐縣的故事，恰似一面多棱鏡，折射出這個蘇北小縣的豐富面相，折射出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所想所為，折射出大時代中不同政治力量的取向與抉擇，還折射出民國時代的諸多特徵。

<sup>219</sup>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湖西工作討論記錄（1943年2月26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中冊，頁522。

<sup>220</sup>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參·全民抗戰》，頁142。

<sup>221</sup> 《日記》，1945年5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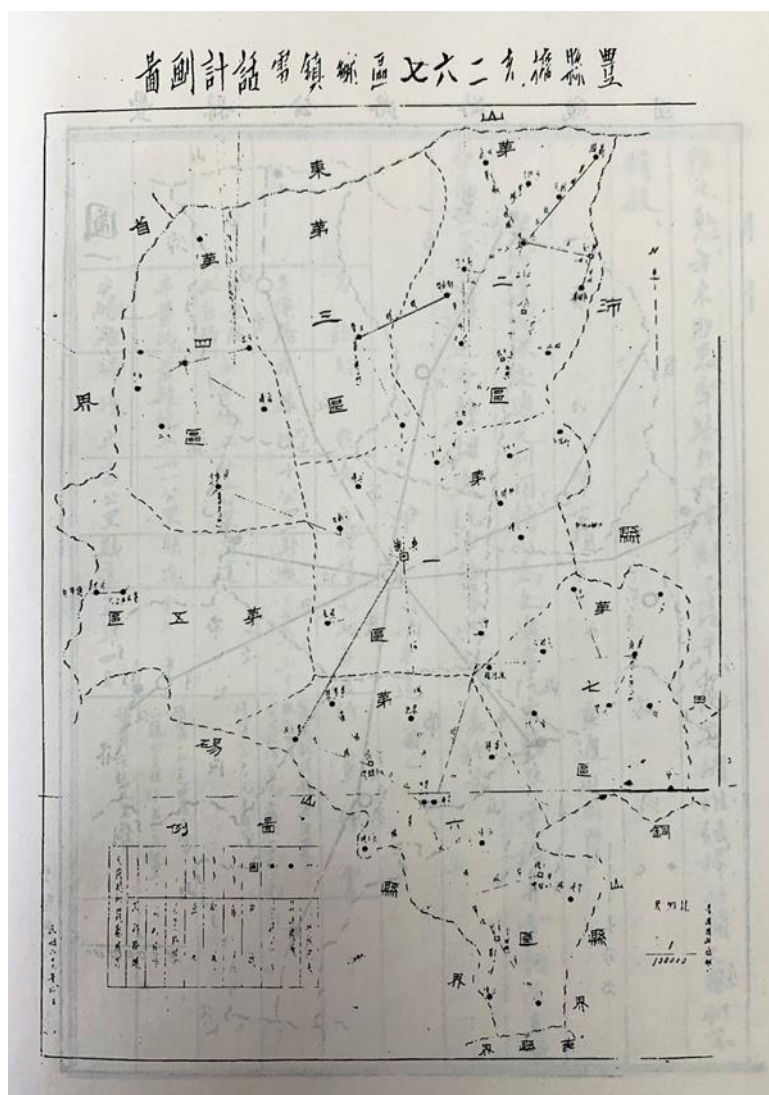
## 附圖



【圖一】豐縣在蘇魯豫皖地區位置圖

此圖顯示了豐縣的地理位置，該縣位於江蘇省的西北端，與省內的沛縣、碭山縣毗鄰，地處江蘇、山東、河南、安徽四省交界地帶，靠近兩條重要的交通幹線津浦線和隴海線，可見其戰略位置十分之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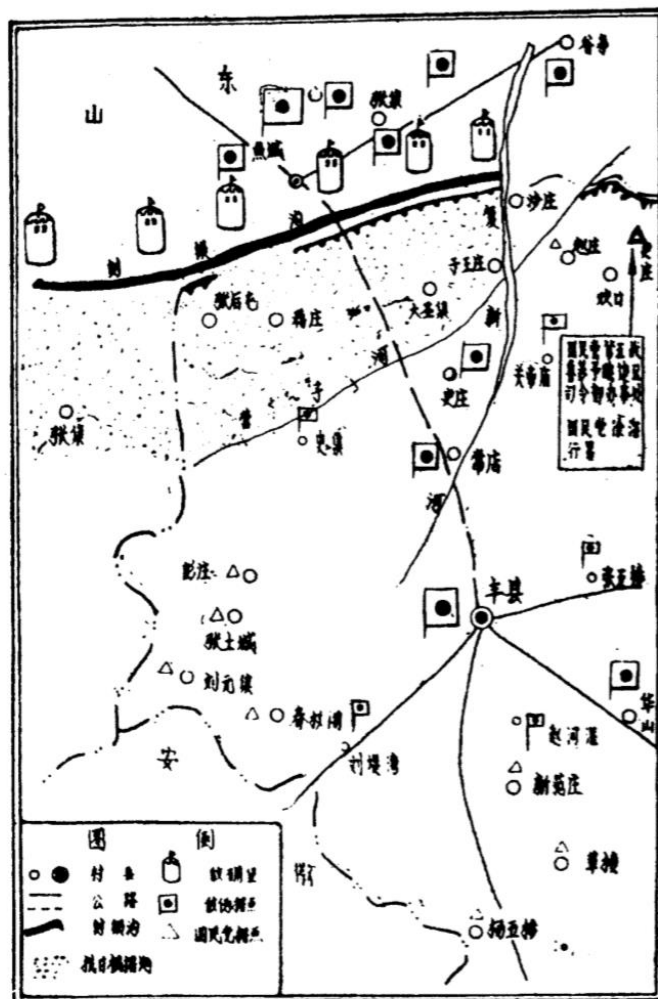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北部江蘇省兵要地誌概況（兵要地誌資料）地資第8號（昭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670900。



【圖二】豐縣行政區劃圖

此圖顯示了豐縣的行政區劃，全縣劃分為七個區，縣城所在地為第一區，位於全縣的中心地帶，第二、第三、第四三區位於縣境北部，第五區位於縣境西部，第六、第七兩區位於縣境南部。

資料來源：楊時須，〈豐縣政務處理財政警政區治實習報告〉，南京圖書館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情調查報告》第143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24。



1941年—1943年丰县抗日形势图

【圖三】1941-1943 年豐縣抗日形勢圖

此圖顯示了1941年至1943年豐縣複雜的軍政形勢。1940年七月，國共關係破裂後，豐縣形成了國、共、日偽「三足鼎立」的局面，國民黨豐縣政府和豐常控制第二、第六、第七三區；中共佔領了第三、第四、第五三區；縣城和第一區為日偽所占。

資料來源：中共豐縣縣委黨史辦公室、豐縣檔案局編，《豐縣革命史料選·第五期》（內部資料，1986），正文前插圖。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山東分局關於蘇魯豫邊區肅托鬥爭的總結報告(1940年6月)〉，《革命歷史檔案》，濟南：山東省檔案館藏，G001-01-0052-004。
-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北部江蘇省兵要地誌概況（兵要地誌資料）地資第8號」（昭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670900。
- 《抗剿書牘》，豐縣檔案館藏，101-1-178。
- 〈李仙洲電蔣中正（1943年7月19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臺北：國史館藏，002-090200-00082-281。
- 〈第六屆江蘇省政府委員會會議記錄（第922次會議）（1937年8月10日）〉，南京：江蘇省檔案館藏，1001-甲-301。
- 《黃體潤日記》，豐縣檔案館藏。
- 〈蔣中正電湯恩伯（1943年2月13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臺北：國史館藏，002-090106-00016-329。
- 〈衛立煌電蔣中正（1940年6月28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臺北：國史館藏，002-090300-00203-012。
- 〈韓德勤電蔣中正（1940年1月3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臺北：國史館藏，002-090300-00219-012。
- 〈韓德勤電蔣中正（1940年7月15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臺北：國史館藏，002-090300-00202-091。

### 二、史料彙編

- 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內部資料，1979。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7-11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江蘇革命史史料・第八輯》，內部資料，1983。
- 中共徐州市委黨史辦公室編，《徐州黨史資料・第九輯》，內部資料，1985。

- 中共徐州市委黨史辦公室編，《徐州黨史資料·第十輯》，內部資料，1986。
- 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冀魯豫小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第十一集》，內部資料，1988。
- 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冀魯豫小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湖西地區專輯》，內部資料，1994。
- 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冀魯豫小組編，《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第二十一集》，內部資料，1996。
-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編，《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第八期》，內部未定稿，1985。
-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上、中、下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三輯·專題部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
-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研究會編，《冀魯豫黨史研究資料·第七輯》，內部資料，1995。
- 中共豐縣縣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豐縣檔案局編，《豐縣革命史料選·第四期》，內部資料，1985。
- 中共豐縣縣委黨史辦公室、豐縣檔案局編，《豐縣革命史料選·第五期》，內部資料，1986。
- 中共豐縣縣委黨史辦公室、豐縣檔案局編，《豐縣革命史料選·第六期》，內部資料，1986。
- 中共豐縣縣委黨史辦公室、豐縣檔案局編，《豐縣革命史料選·第八期》，內部資料，1988。
- 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參考資料》，第3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
- 本書編寫組、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安徽省文物局新四軍文史徵集組編，《皖南事變資料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 江蘇省豐縣縣誌辦公室、檔案局合修，《豐縣簡志》，內部發行，1986。
- 周充華主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豐縣組織史資料（1928-1987）》，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 南京圖書館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情調查報告》，第 143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 孫占元、楊明清主編，《山東重要歷史事件·抗日戰爭時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 徐州市歷史編寫辦公室編，《徐州史料·第三輯·黨史資料專刊》，內部資料，1982。
- 張世瑛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2·補編（民國 28 年 1 月至 6 月）》，臺北：國史館，2015。
- 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黃體潤，《黃體潤日記》，第 5、6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

### 三、專書

- 中共碭山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湖西「肅托事件」研究》，內部資料，2005。
- 中共蕭縣縣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蕭縣地方史（1919-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 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華中抗日根據地建設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
- 本書編寫組，《中共湖西地區黨史文稿》，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
- 江蘇省豐縣史志辦公室編，《中共豐縣地方史（1919-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參·全民抗戰》，臺北：國史館，2015。
-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 袁玉驍主編，《湖西「肅托」始末》，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
- 徐州市史志辦公室編，《中國共產黨徐州地方史》，第 1 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年。

### 四、期刊論文

- 王奇生，〈戰前中國的區鄉行政：以江蘇省為中心〉，《民國檔案》，第 1 期（2006），頁 66-78。
- 黃道炫，〈密縣故事：民國時代的地方、人情與政治〉，《近代史研究》，第 4 期（2017），頁 4-23。

### 五、報刊資料

- 蘇明，〈豐縣舉辦壯丁訓練的經過〉，《江蘇時事月刊》，第 5 期（1937），頁 20-23。

### 六、學位論文



郭寧，《走向一元化：抗戰時期中共山東武裝力量的整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

#### 七、網路資料

張電光，〈參加八年抗戰剿匪之經過〉，《豐縣文獻》，第 3 期（1979），臺灣大陸同鄉會文獻數據庫（<https://www.tongxianghuicn.com/article/818310.jhtml?libId=>），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責任編輯：陳奕丞）